

合作与交际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04

2015年 第四期
总第三十二期



独家策划

P32

全球青年创新之夜： 共赴北大的约定

P18 以口述还原历史：
燕园洋弟子的北大记忆

P44 方文山的文化讲堂：
我喜欢有中华底蕴的东西

P80 为了下一代人的气候正义
——全球气候变暖研究之父
詹姆斯·汉森眼中的气候与政治

中阿跨文化交流之路项目介绍

中阿跨文化交流之路（CAMEL）是 SICA（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旗下与卡塔尔大学交流的新项目。活动由国际合作部提供指导，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付志明教授担任指导教师，中阿跨文化之路项目组负责执行。它以卡塔尔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主要文化体验平台，促进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交流。项目为异地双会期，多哈会期和北京会期分别在寒暑假举办。团队成员来自于 SICA 的核心团队，是跨域交流经验丰富、偏好文化体验的组织者。

CAMEL 来自全校各学部的代表以中国与中东关系为交流的基点。活动得到了北京大学和卡塔尔大学的大力支持，并在两所大学的指导下分别在卡塔尔与中国举办一系列有影响力、创造力、交流性的活动，涵盖学术研讨、著名企业机构参访等。同时，两校大学生也将携手参与文化之旅，卡塔尔大学成员的中国之行与北京大学成员的多哈之旅为彼此提供了体验异国文化的机会，雄伟的万里长城和浩瀚的阿拉伯沙漠将成为成员们难忘的经历。一次筚路蓝缕的活动经历、两大典雅维新的文明交汇、三个有趣深刻的核心议题将成为 30 名中卡青年的共同记忆。



本刊声明

《合作与交流》所有内容，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变、摘编、转载和传播。

主 办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北京大学港澳台办公室

编委会主任

夏红卫

编委会

夏红卫 严 军 郑如青
王 勇 李洪权 康 涛

执行主编

韩 笑 张学金

执行副主编

刘 东

编 辑

艾新雅 叶陈宁 冯子涵
王子怡 刘世琪 董怡楠

美 编

易格设计

电 话

010-62759098

传 真

010-62751240

电子邮件

hanxiao@pku.edu.cn

网 站

<http://www.oir.pku.edu.cn>

上期 | 内容提要



共赴绿色的约定

——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首届“生态暑期项目”在贵州举行

2015年7月10-19日，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GAUSF)首届“生态暑期项目”在贵州举行。本期暑期项目围绕“走向可持续人类纪的地方智慧”(Local Wisdom for Sustainability in the Anthropocene)这一主题展开。该项目为期十天，旨在通过多元丰富的系列生态讲座和对贵州当地生态环境的实地考察，让学生了解并发现贵州乃至中国的生态现状与地方智慧，践行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的宗旨和理念。本期活动由北京大学牵头发起，北京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同承办，来自生态文明国际大学联盟的十二所成员学校的5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期项目。

中非友谊：俱往矣，看今朝

2015年9月10日上午，《中国、非洲和中非关系概况500句》发行式暨“汉语桥——中非友谊知识竞赛”启动仪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活动由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和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家汉办共同主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北京大学协办。发言嘉宾对中非友谊做出了阐释，对中非未来提出了畅想。



◀ P32
独家策划

全球青年创新之夜：共赴北大的约定

2015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重要高潮环节“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峰会”和“全球青年创新之夜”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用智慧和热情点亮当晚的夜空，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与艺术交相辉映”的“创新之夜”。本次全球青年创新节为大家呈现的，不仅是最性感的科技沙龙、最尖端的核心技术、最新锐的创业构想，还有北京大学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精神。无论是对当代大学生，还是对那些有志于投身科技产业、向创新时代迈进的人，青年创新节都让他们看见未来，赞叹未来；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能够坚定信念，在今后的科技展览中带来更多的创意产品。



▶ P18
热点聚焦

以口述还原历史：燕园洋弟子的北大记忆

“大家好，我是吉米，北大77级校友。”10月25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北京分社前社长兼首席记者吉米·福罗库兹（Jaime FlorCruz）用流利的中文向观众介绍自己。

时事 CURRENT AFFAIRS

04 新闻概要

17 辞海拾英

热点聚焦

18 以口述还原历史：
燕园洋弟子的北大记忆

燕园盛事

28 “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
——北京论坛（2015）在钓鱼台国宾馆
隆重开幕

独家策划 SPECIAL REPORT

32 全球青年创新之夜：
共赴北大的约定



◀ P44

未名嘉宾

方文山的文化讲堂： 我喜欢有中华底蕴的东西

他是音乐才子周杰伦的完美搭档，是众多华语歌手的金牌作词人，一旦歌词落到方文山手里，不再只是单纯的流行文化，更是传统文化的美丽嫁衣。



◀ P74

讲学现场

文化记忆：理论旅行与跨学科讨论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北大讲演录

11月29日下午，应北京大学与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做客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分别发表了题为“一神论的起源与未来”和“现代时间管理机制的兴起与衰落”的公开演讲。当晚，阿斯曼夫妇还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社科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进行座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担任上述活动的主持，社科院哲学所王歌博士担任翻译。

人 物 PEOPLE

未名嘉宾

- 44 方文山的文化讲堂：
我喜欢有中华底蕴的东西

名校掌门

- 48 建设与众不同的综合性大学
——专访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东风桃李

- 52 我爱的中国，她莫名其妙
——英国留学生王大雄的中国故事
- 57 从“汉语桥”到“一带一路”
——柯修的北大情结

学者风采

- 61 蒋晖：“我们到了需要
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了”

交 流 COMMUNICATION

游学纪闻

- 66 本格·北海道大学
- 70 学术盛宴，人文关怀
——孙拓眼中的“伯克利加州大学领导力培养计划”

观 点 VIEWPOINTS

讲学现场

- 74 文化记忆：理论旅行与跨学科讨论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北大讲演录

学者视角

- 80 为了下一代人的气候正义
——全球气候变暖研究之父詹姆斯·汉森眼中的气候与政治

合作与交流
COOPERATION & COMMUNICATION

2015年 第四期 总第三十二期

【学术前沿】

《柳叶刀》刊载北大医院肾脏内科系统综述——化降压治疗的心血管保护效益更高

11月6日,《柳叶刀》刊载了一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脏内科吕继成主任医师(通讯作者)所在的科研团队完成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论文结论表明,强化降压治疗能够为高血压患者,尤其是心血管高危人群提供更多的心血管保护效益。该论文由吕继成主任医师研究团队与澳大利亚乔治国际卫生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北大医院博士研究生解新芳为第一作者。

本论文共入选19项临床试验,纳入近45000例患者,结果表明,强化降压治疗可改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心梗、卒中、蛋白尿及视网膜病进展等,但对总死亡率、心衰、心血管死亡及终末期肾病的发生无影响。这一结论对近期JNC8、ESC/ESH指南所提倡的“宽松降压”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这一系统综述为强化降压提供了有力证据,与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SPRINT研究结果相呼应,指导日后出现更多的临床研究以寻找降压治疗目标值及其适应人群,这些都将是影响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的制定。

海洋研究院刘谋斌研究员出版英文专著“Particle Methods for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刘谋斌研究员撰写的专著“Particle Methods for Multi-Scale and Multi-Physics”近期由著名科技图书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出版(ISBN: 978-981-4571-69-2)。

该书从微观尺度、介观尺度到宏观尺度介绍了分子动力学(Molecular Dynamics, MD)、耗散粒子动力学(Dissipative Particle Dynamics, DPD)以及光滑粒子动力学(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 SPH)等三种粒子类方法的基本理论、数值方法及内在联系。该书也结合刘谋斌研究员及合作者多年的研究工作,阐述了相关粒子方法的一些最新理论模型与数值方法,并给出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众多应用,包括微流动和生物流动(微液滴动力行为、高分子悬浮与输运、细胞变形、粘附与

运移等),环境与地质流动(多孔介质与裂隙网络中多相流动、溃坝、泥石流等),自由液面流动(波浪砰击、液体晃荡、结构出入水、溢油拦截等)。该书所展示的理论模型、数值方法及示范案例将有助于推动粒子类数值方法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该专著所涉及的部分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942004、11172306、11302237、50976108、U1530110)、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经费支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干燥综合征早期诊断新方法获国际权威期刊封面推荐

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课题组张霞等撰写的《涎腺超声对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价值：两种评分系统的比较》发表在英国风湿病权威杂志 *Rheumatology* 【2015 Sep; 54 (9) : 1680-7】，并被该期杂志作为封面论文推荐。

这项研究对 105 例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患者及疾病对照组进行了腮腺超声检查，发现这项检查的敏感性为 88.6%，特异性为 93%，方便、无创、实用，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系统评价了唾液腺超声（SGUS）在干燥综合征（SS）诊断中的价值。

目前，干燥综合征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化验和有创的唇腺活检或腮腺造影，但唇腺活检等检查因其创伤性、放射性或价格昂贵而不易为患者所接受，大大影响了该病的早期诊治。涎腺超声技术在干燥综合征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可能在降低早期干燥综合征的漏诊率中发挥作用，并成为疾病病情评估的新方法。

国内当前有近 800 万干燥综合征患者，但该病临床诊断困难，缺乏敏感性高且特异性强的诊断方法，易造成漏诊及误诊，特别是对新发或早期疑诊的干燥综合征。本研究为干燥综合征诊断提供了新方法，可明显提高本病的早期诊断率。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贾欣茹教授课题组在力诱导荧光变色研究取得新进展

力诱导荧光变色材料在诸多领域，例如机械感应、压力感应、荧光探测、保险纸张、生物体中力的检测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分子系贾欣茹教授课题组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将罗丹明衍生物共价交联于聚合物结构中，制备了基于聚氨酯的聚合物薄膜。研究发现，该薄膜具有对力和光的双重响应性质。在外力作用下，由于聚合物结构中的罗丹明衍生物发生开环反应，引起聚合物薄膜的荧光颜色从暗蓝色转变为粉红色。此外，聚氨酯薄膜在紫外光的照射下也可以发生可逆的颜色转变。该工作发表在 *Adv. Mater.* 2015, 27, 3934 - 3941。

最近，该课题组与马玉国教授课题组合作，利用 B 原子的配位作用，制备了具有三色转变性质的力响应有机单晶分子。在外力作用下，由于分子结构中的四苯基乙烯（TPE）单元从晶态向无定型转变，发光从蓝色变至绿色，进一步在外力作用下，分子中的罗丹明 B 发生开环反应，从而显现出红色。该项工作近期发表于 *Angew. Chem. Int. Ed.* DOI: 10.1002/anie.201507197。

相关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的资助和北京大学的支持。

北大工学院成功研制新型人机协作机器人

近日，由北京大学工学院先进智能机械系统及应用联合实验室、北京大学高精尖中心研制的国内第一款高带宽、轻型、节能型人机协作机器人“WEE”先后在上海世博会（11月3日至7日）、深圳高交会（11月16日至21日）、北京世界机器人博览会（11月23日至25日）上参展亮相，吸引了众多观众和专业人士的眼球。

机器人产品“WEE”延续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工学院先进智能机械系统及应用联合实验室主任、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刘立教授早些年在国际空间站、医疗机器人等多个机器人项目上的理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据该产品研发团队的梁文渊博士后介绍，目前人机协作机器人代表了世界机器人发展新的主流方向，也是国内机器人企业能否登上世界机器人舞台的关键技术。“WEE”在轻型化方面达到了负载自重比接近 1:2，该技术指标领先于国际同类产品。另外，“WEE”采用的核心控制技术在提高机器人系统带宽、实现高精度操作尤其是动态精度、实现完整的力控制策略等方面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WEE”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内乃至国际上第一台高带宽、轻型、节能机器人。

新材料学院发现新型单双层二维材料及在锂电池中应用

近日，在潘锋教授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新材料学院 2014 级直博生刘同超和博士后冯炎聪等人与团队老师和同学合作，在学院前期研究基础上开展了对 LiFePO_4 新型方法的研究。在合成新型 LiFePO_4 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一种全新只有单层 / 双层 $\text{Fe}_3(\text{PO}_4)_2 \cdot 8\text{H}_2\text{O}$ 二维材料，并实现了这种二维材料单双层的可控制备。通过实验和理论计算，他们全面揭示了单层 / 双层 $\text{Fe}_3(\text{PO}_4)_2 \cdot 8\text{H}_2\text{O}$ 二维材料的形成机理，即在 H_2O / 乙二醇 / 晶体界面为模板的可控外延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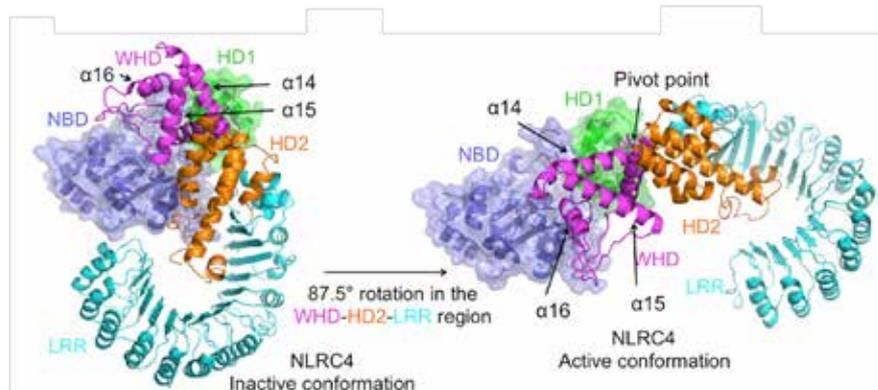
这种新型二维材料与碳黑球磨后做正极材料展现出优异的电池性能——0.1C 容量可以达到 185mAh/g，在 10C 下循环 400 次容量仍能保持 98% 以上，以及 20C 大倍率充放电时仍有 107mAh/g 的容量。更有趣的是，在这种二维材料的充放电中，出现了 5–10nm 的 LiFePO_4 纳米晶晶体。该研究成果以“Formation of mono/bi-layer iron phosphate and nucleation of LiFePO_4 nano-crystals from amorphous 2D sheets in charge/discharge process for cathode in high-performance Li-ion batteries”为题发表在最近一期的国际新能源材料顶级杂志 *Nano Energy* 上 (doi:10.1016/j.nanoen.2015.10.016, SCI 影响因子 10.3)。

该工作的合作者还包括学院兼职教授，如林原教授、美国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 Wangli Yang 教授、美国阿贡实验室的 Khalil Amine 教授等。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重大专项，广东省引进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深圳孔雀计划及深圳市科技创新基础项目等基金的支持。

毛有东、欧阳颀课题组与其合作者在 Science 发表炎症复合体冷冻电镜结构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毛有东研究员、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 定量生物学中心欧阳颀院士与哈佛医学院吴皓教授合作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解析了近原子分辨率的炎症复合体的三维结构，首次阐释了其复合物在免疫信号转导过程中的单向多聚活化的分子结构机理。该研究工作以“Cryo-EM Structure of the Activated NAIP2/NLRC4 Inflammasome Reveals Nucleated Polymerization”为题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 *Science*。

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的诸多限制，使得高分辨结构分析可以直接在单分子水平进行。炎症复合体的结构分析对现有的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毛有东、欧阳颀教授课题组利用他们发展的冷冻电镜数据分析的新算法，通过并行统计机器学习，实现了在超级计算机中对这些细微动态构象的深度分离，从而提取出高度纯化的炎症复合体单颗粒图像的数据集，使得高分辨三维重建成为可能。其中 11 环结构的分辨率达到 4.7 埃，使得炎症复合体三维原子结构建模成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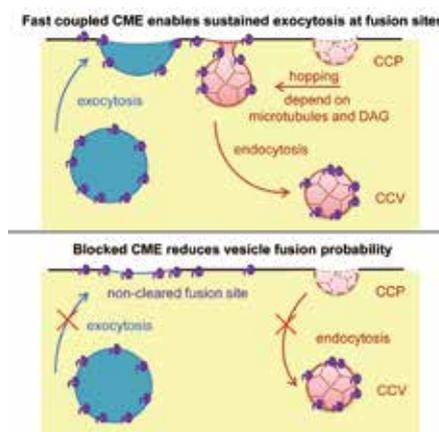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定量生物学中心博士研究生陈硕冰与哈佛医学院博士后张丽曼为文章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青年千人计划研究员毛有东与哈佛医学院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吴皓为共同通讯作者。这一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科研启动经费、北大—清华联合生命科学中心、Intel 并行计算研究基金和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的资助。

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陈良怡研究组在 *Dev Cell* 杂志发表胞吐-胞吞耦联新机制研究成果

2015年10月1日,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陈良怡研究组在 *Developmental Cell* 杂志在线发表题为“Diacylglycerol Guides the Hopping of Clathrin-Coated Pits along Microtubules for Exo-Endocytosis Coupling”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生袁天一等人运用超高 Z 轴分辨率活细胞荧光成像技术,结合自动图像分析算法和电生理膜电容记录等方法,研究发现胰岛素分泌细胞存在新的胞吐胞吞耦联机制。

袁天一等人发现胰岛素分泌细胞的细胞膜胞吐位点附近存在预先形成的网格蛋白包裹小窝,在囊泡分泌后迅速运动到胞吐位置,然后被吞入。他们进一步证明这种可以运动的网格蛋白包裹小窝是沿着细胞膜下的微管纤维运动到胞吐的位置的。应用成像手段,他们观察到分泌发生时,具有负曲率的二酰基甘油(diacylglycerol, DAG)在胞吐位置发生瞬时富集,减少局部膜张力,从而促进网格蛋白包裹小窝向胞吐位置移动。文章最后还证明,在抑制 CME 的情况下,多次去极化刺激导致的囊泡分泌受到明显抑制,胞吞回收囊泡膜蛋白的过程也受到显著的抑制,从而阐明了与调节型胞吐耦联的 CME 的重要生理功能。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陈良怡研究员和刘彦梅副研究员是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生袁天一、柳林、维力斯及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张永登,为文章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生赵世群、郑晓璐、黄小帅等人参与了此项研究。该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和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王德明课题组在早期种子植物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近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王德明教授与国内外同行合作,从华南晚泥盆世地层中发现并研究了一种新植物——*Latisemenia longshania* (龙山侧籽,与片化的营养叶伴生),拓展了早期种子植物的地理分布范围。*Latisemenia* 兼有顶生和对生(侧生)的胚珠,这也是对生胚珠的最早化石记录,为种子植物后期类群中胚珠排列方式多样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宽大、高度愈合的珠被裂片有助于授粉和保护珠心。单胚珠、较低矮的壳头显示出进化性状。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 B 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论文题目为“*Latisemenia longshania*, gen. et sp. nov., a new Late Devonian seed plant from China” (*Proc. R. Soc. B* 282: 20151613),课题组薛进庄副教授、博士生黄璞、刘乐等参与了该项研究。

此外,种子植物的雄性繁殖器官——花粉囊在泥盆纪晚期非常少见,特征和演化尚待更多认识。前人认为最早的花粉囊结构简单,不是聚合囊,与祖先类群(前裸子植物)的繁殖器官难以区分。然而,王德明课题组从华南晚泥盆世地层发现并研究了一种新的花粉囊——*Placotheca minuta* (小型钵囊),对这种认识提出了不同观点。*Placotheca* 的结构复杂,属于聚合囊,椭圆盘形囊托的边缘着生众多基部和侧面愈合的小孢子囊,但是花粉较为原始。钵囊的发现还表明,最早的种子植物花粉囊的宏观形态与花粉表现出镶嵌演化,花粉囊呈现高度进化特征和多样性,而花粉的演化相对较慢,停留在三射线孢子的水平。相关研究结果于 2015 年发表在 Nature 出版集团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论文题目为“*A Late Devonian fertile organ with seed plant affinities from China*” (*Sci. Rep.* 5, 10736),课题组薛进庄副教授、博士生刘乐等参与了该项研究工作。

上述两项研究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2007)、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2012CB821900)以及北京大学“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光华和统计中心关于北京城区 PM2.5 污染状况的研究被《皇家学会会刊》接收

日前，由陈松蹊教授带领的光华管理学院和统计科学中心的环境大数据研究团队关于北京城区 PM2.5 污染状况的研究 (Assessing Beijing's PM2.5 Pollution: Severity, Weather Impact, APEC and Winter Heating) 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正式接收。

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光华商务统计系博士生梁莹，其它作者是邹韬 (光华博士生)、郭斌 (毕业于光华，川大助理教授)、李硕 (光华博士生)、张豪哲 (Iowa State University 统计系博士生)、张澍一 (光华博士生)、黄辉 (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统计科学中心助理教授)、陈松蹊 (光华管理学院，统计中心)。陈松蹊和黄辉为共同通讯作者。

环境大数据研究团队的文章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过去五年北京 PM2.5 浓度与气象变量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公平地评估不同年份 PM2.5 浓度是否有显著改善的方法。该文章提出应该去除掉气象变量的影响，对原始浓度进行调整以反映真实的城市污染、排放情况，从而为政府环保部门提出合理的、科学的指导方案。文章中提出的统计学方法可以广泛地用于其它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评估。

该研究得到了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的资助。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王永锋课题组成功制备配位与氢键分形晶

近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纳米器件物理与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年千人计划”特聘研究员王永锋课题组与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吴凯教授，信息学院侯士敏教授、彭练矛教授等合作，成功制备出基于配位键的分形晶，并观测到分形晶与传统晶体的共存与竞争。相关成果以题为《具有 C3 ν 点群的谢尔宾斯基三角分形晶》(Sierpiński-triangle fractal crystals with the C3 ν point group) 和《分形晶与传统晶体的共存与竞争调控》(Controlling molecular growth between fractals and crystals on surfaces) 的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化学快报》(*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2015, DOI: 10.1016/j.ccllet.2015.08.006) 和《美国化学会·纳米》(*ACS Nano*, 2015, DOI: 10.1021/acsnano.5b04427)。实验研究部分由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李娜，博士研究生张雪、顾高臣主要完成，理论计算部分则主要由博士研究生王昊完成；华中科技大学吕京涛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唐浩研究员、玛丽·居里-斯克罗多夫斯卡大学 Pawel Szabelski 教授等也参与了研究。

以上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资助。

刘忠范院士课题组在石墨烯玻璃方面的研究被 Nature Materials 报道

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化学气相沉积的方法，通过优化生长条件，在玻璃表面成功地实现了石墨烯的直接生长。通过对反应气体浓度、生长温度和生长时间的精确调控，刘忠范科研团队成功克服了玻璃表面催化裂解前驱体能力低，碳碎片在基底表面迁移能力弱等难题，在耐高温玻璃 (*Nano Lett.* 2015, 15, 5846-5854) 和普通玻璃 (*Adv. Mater.* 2015, DOI: 10.1002/adma.201504229; *Nano Research* 2015, 8, 3496-3504) 上成功实现了高品质石墨烯薄膜的可控生长。

在石墨烯生长条件下，普通玻璃以熔融状态存在，表面高度均一并且各向同性，利用熔融态玻璃的这些性质，课题组生长出尺寸和分布都很均匀的石墨烯圆片。利用直接生长方法获得的石墨烯玻璃，具有玻璃与石墨烯的界面接触良好、界面无污染等优异特性。熔融态玻璃表面生长石墨烯的工作，被 2015 年 10 月出版的 *Nature Materials* 以研究亮点的形式进行了报道和关注 (*Nature Materials* 2015, 14, 1186)：“这项工作利用了熔融态玻璃表面各向同性的特点，实现了石墨烯均匀成核”“石墨烯玻璃可以应用于智能加热器件”“整个生长过程与玻璃生产过程相类似，熔融态玻璃铺展在液态锡表面，从而获得光滑平整的玻璃”。

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 (2013CB932603, 2012CB933404, 2011CB921903, 2013CB9346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1432002, 51290272, 51121091, 51222201, 11222434)、教育部 (20120001130010) 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Z151100003315013) 等项目的资助。

【国际舞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爱国教授受邀出席美中关系委员会庆祝大会

10月14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爱国教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简称NCUSCR）会长斯蒂芬·欧伦斯（Steve Orlins）先生的邀请，出席了该会在美国纽约第5大道普拉则饭店举行的NCUSCR成立49周年颁奖晚宴。

其间，李爱国近年创作的《夕照三峡图》和《大江东去图》两幅中国山水画作品，被作为奖品分别颁发给全美最大私募基金黑石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和全球最大药企辉瑞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晏瑞德（Ian C. Read），以表彰两人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出席此次颁奖晚宴的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美国驻中国前大使雷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以及来自中美政府、商业、企业和智库等各界嘉宾约500人。

宴会临近结束，希尔斯再次对李爱国表示感谢。宴会期间，基辛格等诸多嘉宾对李爱国的两件中国画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五届北京大学学生海外学习暨港澳台交流教育展隆重举行

11月19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的“2015北京大学学生海外学习(EAP)暨港澳台交流教育展”活动在英杰对外交流中心举办。李岩松副校长出席了教育展并向各参展学校表达了感谢。

此次活动安排了教育展、海外高校专场宣讲会与暑期项目专场宣讲会。共邀请到近30所大学、使馆以及教育机构为同学们集中介绍海外留学概况，集中全面地提供了现场咨询以及与海外大学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在教育展交流现场，各高校的宣讲代表们积极向同学们介绍本校的院系及专业情况，同学们可第一时间与院校确认相关申请资格及招生流程。

除校方代表，部分参展学校还邀请目前就读于北大的本校交流学生，国际合作部的老师也在宣讲会中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EAP项目的申请流程、奖学金、学分转换等问题。此外，国际合作部老师、港澳台办公室的负责老师都纷纷帮助答疑，现场气氛热烈。整个活动在师生间的互动问答中圆满的落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黎晓新教授在美国眼科学会2015年会作主题发言

2015年11月14日至17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黎晓新教授受邀出席2015年美国眼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AAO）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的国际视网膜大会（Retina Subspecialty Day），并作大会发言，这是国际视网膜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美国AAO大会作为全球最大、最广泛的眼科研究科学会议，此次的大会主题为“加大赌注”，预示视网膜治疗领域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黎晓新教授在大会的Uodate专场应邀报告了康柏西普治疗中国人高发的AMD亚型PCV（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的情况。

30多年来，黎晓新一直坚持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一线，是我国眼科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开拓者之一。她将基础科研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外伤的手术治疗、眼部肿瘤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手术治疗和视觉电生理等领域的诊断与手术治疗等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黎教授曾牵头制定全国防治指南，极大地降低了我国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并创建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童眼病中心，为保护儿童的视觉健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黎教授提高了我国眼科在世界的地位。

北京-悉尼大学日活动举办

11月26日,悉尼大学校董会主席贝琳达·哈金森(Belinda Hutchinson)女士、校长迈克尔·思朋斯(Michael Spence)教授率代表团30余人来校访问,举行“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接待了代表团一行,并出席了“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相关活动。

上午,“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开幕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林建华在欢迎辞中赞扬了悉尼大学在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所获得的学术声誉,并回顾了两校的合作历程与长期友谊。

之后,思朋斯以“A University for China”为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悉尼大学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新颖办学理念及发展趋势,也使北大同学们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演讲会结束后,悉尼大学代表团与北大近40名学者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商讨双方进一步合作事宜,加强联合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第十届中韩国家治理论坛

2015年10月24日,国家治理论坛·2015中韩“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及韩国成均馆大学、世宗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和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是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治理论坛”系列之一。

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副校长马仁燮(Ma In Sub)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景鹏教授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浦劬主持。

系院长燕继荣教授主持表示,本次研讨会已经从“民主”议题演进到“社会治理”的议题,他希望中韩双方能继续保持这种友好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学术共同体,为推进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举行正式成立揭牌仪式

2015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PKU-APEC Health Science Academy, PKU-APEC HeSAY)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吴涪,亚太经合组织生命科学创新论坛(APEC LSIF)代表Kate Clemans女士,教育部、商务部、国家卫计委等部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代表,APEC生命科学创新论坛RHSC代表Ranganathan博士等有关机构的嘉宾和代表,中国药审中心、美国哈佛大学及国内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等单位专家代表100多人出席了揭牌仪式。APEC事务的高官谈践专门委派代表对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

健康科学研究院的建立将进一步推动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间的合作,使北京大学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人口健康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促进北京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亚太和世界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北大荣誉】

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 2015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北京时间 2015 年 10 月 5 日 17 时 30 分，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女科学家、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因在疟疾治疗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荣获该奖项。她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屠呦呦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培训中医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 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前后分别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 年 9 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北大药学院焦宁教授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2015 年 9 月 25 日，北大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焦宁教授近日收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颁发的证书，当选为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成立于 1841 年，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化学学术团体，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学会之一，是一个国际权威的学术机构。通过专家推荐，学会每年遴选英国及国际上在化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就和为推动化学科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为其会士。

北大七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5 年 12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2015 年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北大张平文、谢心澄、席振峰、黄如、俞大鹏、倪晋仁六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张远航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人数连续三次居全国高校首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目前在北大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74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1 人。院士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一。



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张婉愉荣获 2015 年度罗德奖学金

具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美誉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于 12 月 7 日公布了 2015 年度获奖名单。在全球超过 1.2 万名申请者中，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张婉愉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得该奖学金的四位中国大陆在读学生之一，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北京大学本科生。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德兹（Cecil John Rhodes）自 1902 年创设的奖学金，旨在资助“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学深造。因其每年极低的录取率，“罗德学者”被视为全球影响力最高的青年荣誉之一。今年是该奖项首次面向中国大陆在读学生开放申请。

北京大学学生团队在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中荣获全国特等奖

11 月 20 日，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广东工业大学体育馆落下帷幕。赛事组委会经过网络初评、集中复评、决赛封闭问询和公开答辩，最终评定北京大学 2012 级社会学系本科生任鹤坤等同学的作品“‘情理之治’：基层信访办的运作逻辑——北京市 A 乡‘无理上访’的案例分析”获得全国特等奖；作品“时间压力对人类决策中利己—亲社会动机竞争的影响”“新型廉价稳定的敏化太阳能电池电极的研究与应用”“通过调节钉纳米颗粒表面氧化状态触发单电子转移交叉脱氢偶联反应”以及“基于 CGE 模型的宁波市低碳政策模拟分析”荣获全国二等奖；作品“中国式网络购物狂欢节动力机制建构与实证研究”获得全国三等奖；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严纯华院士、生命科学学院张博老师、心理学系周晓林老师、社会学系周飞舟和卢云峰老师、光华管理学院李琦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北京大学捧得“优胜杯”并荣获优秀组织奖。

比赛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学校部部长杜汇良，北京团市委副书记黄克瀛等领导来到北京大学作品展示台与北大参赛选手进行了亲切交谈，了解参赛作品，并鼓励青年学生发挥北大的传统学科优势，借助“挑战杯”平台努力做好学术科技创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好时代，依靠北大的优势资源，带动全国青年创新创业新发展。校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在得知北大学子的获奖消息后，对获奖同学表示了祝贺，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获“2015年度健康促进卓越医院”称号

2015年11月28日，由健康时报社、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健康传播与医学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健康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因在医院宣传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誉“2015年度健康促进卓越医院”。

近年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服务医院中心工作”为工作出发点开展全院宣传工作，坚持“精诚合作，团结互助，有效沟通，快速反应”的团队精神，把握医院的宣传舆论导向，第一时间发布医院新闻动态，宣传报道医院先进人物、名医、名师和优秀团队，举办医院健康科普大赛，挖掘、培养健康科普人才，向患者群体普及科学的健康知识，并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指导支持下举办首届中国医院宣传与媒体交流论坛，树立优质的医院形象和文化品牌，把医院经营管理的目标和服务理念充分体现在宣传工作之中，为医院中心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开创了医院宣传工作的全新局面。

城市与环境学院吴必虎教授当选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

2015年10月19日，国际旅游研究院发布通告，宣布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等6名杰出旅游研究者当选新一届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Fellow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据有关部门统计，吴必虎教授在国际顶级旅游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作为第一作者的3篇中文论文在国内30多年间学术论文影响力排名中分列第一、第三和第四位；所著《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一书位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经济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8名。

国际旅游研究院1988年成立于西班牙桑坦德，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旅游学术组织。国际旅游研究院的成立旨在促进旅游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探索，鼓励研究成果的应用，推动旅游知识创新的国际传播与交流。

计算机科学技术系1988级校友周源源教授成为马克·维瑟奖首位女性得主

2015年10月12日，由美国计算机学会操作系统专业组（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Operating Systems）组织评选的2015年度马克·维瑟奖（Mark Weiser Award）揭晓。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系1988级毕业生（同时取得数学专业第二学位）、现执教于圣迭戈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系的周源源教授因在复杂计算机系统缺陷的监测与修复所作出的创新性贡献（for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contributions to detecting and recovering from defects in complex computer systems）而成为该奖的第15位获得者，也是第一位女性获奖者。

被誉为“计算机系统领域的菲尔兹奖”的马克·维瑟奖创立于2001年，每年经严格的提名和评选程序后，最终产生一位职业生涯不短于20年的获奖者，旨在表彰其在操作系统领域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

▾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智库建设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本次会议并讲话。黄益平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出席本次会议。本次启动会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正式公布了首批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名单，共有25家智库入选，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

▾ 北京大学 iGEM 团队在国际大赛中获多个专项奖与金奖

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上午，在波士顿海因斯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 iGEM）中，北京大学代表队从全球280支各高校的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夺得最佳复合生物元件设计奖（Best New Composite Part）、最佳生物元件组合设计奖（Best Part Collection），获得一枚金牌，并荣获4项最佳提名。

今年赴美参赛的队员共由13名在校学生组成，队长张益豪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2级本科生。本年北京大学iGEM团队的指导老师有：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娄春波，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浩千。

▾ 郑晓瑛教授荣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Celso Furtado 社会科学奖

2015年11月18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26届院士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开幕式上宣布了2015年来自包括农业科学、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数学、医学、物理学及社会科学等9个领域的14名TWAS获奖人。从设立TWAS奖到2014年为止，中国大陆地区共有37人获奖，其中北京大学2人。北京大学—APEC健康科学研究院（PKU-APEC, Hesay）院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PKUIPR）所长郑晓瑛教授因其在中国贫困地区开展健康、残疾、环境和社会的多学科研究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土耳其科学家Ayse BUGRA共同荣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2015年度TWAS-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社会科学奖。该奖为巴西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设立，国际专家同行匿名评审并专门奖励为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发展而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截至目前为止，全球共有五位科学家先后荣获该奖。这也是我国高校学者首次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Celso Furtado 社会科学奖。

【五洲宾朋】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一行来访

11月13日上午，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D'Alesandro Pelosi）率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一行来访。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杨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等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大厅迎接来宾。

座谈围绕全球环境问题展开，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及学生代表就如何看待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美两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以及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问题。佩洛西及各议员一一回应，佩洛西强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重要，是影响广泛的重大议题，美中两国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的领导示范作用至关重要。在谈到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时，佩洛西给予高度肯定，她说，美方也将全力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尤其是在相关科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佩洛西充满信心，表示乐观。



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访问北京大学

2015年11月22日，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简称IMU）主席Shigefumi Mori教授访问北京大学。随同来访的还有IMU执行委员会委员Vasudevan Srinivas教授、Hyungju Park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院士，数学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大岳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小博教授与来宾亲切会晤，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许晨阳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Shigefumi Mori一行参观了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在随后的座谈中，陈大岳和刘小博分别向来宾介绍了数学科学学院和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近年来，北大数学学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进了一大批国际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在前沿问题研究以及拔尖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座谈会后，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委员、印度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高级教授Vasudevan Srinivas作了题为“The Bloch-Beilinson Conjecture”的特邀学术报告。

▾ 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11月25日下午，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Bohuslav Sobotka）来访北京大学并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发表演讲。捷克驻华大使利博尔·赛奇卡、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捷克查理大学校长托马什·济玛（Tomasz Dhimmah）等一同来访。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李岩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等会见了捷克总理一行，并参加了演讲会。



在演讲会上，林建华首先致欢迎辞。他说，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悠久，育人成果丰硕，国际交流频繁。捷克是文明之邦，也是世界著名的汉学重镇。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同捷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传统友谊，愿意在人文交流、学生培养、联合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这也符合北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布局和总体发展战略，是双方共赢之举，希望以索博特卡总理此次来访为契机，翻开北大与捷克高等学府间合作交流的新篇章。

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总理在演讲中介绍了捷克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捷克在发展现代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重点阐述了欧盟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 亚太风湿病联盟前任主席 P. Pispati 教授来北大人民医院交流访问

近日，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第12任主席 P. Pispati 教授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栗占国教授邀请来人民医院进行访问与学术交流。

亚太风湿病联盟由亚太地区各国风湿病学学会组成，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风湿病学专业机构之一。作为印度风湿病学学会前任主委的 Pispati 教授，因其突出贡献获得印度风湿病学学会终身成就奖。

Pispati 首先来到风湿免疫科病房和门诊，就疾病诊疗与年轻医师进行了交流，对风湿免疫科在风湿病的规范化管理和诊治方面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许，同时也提出了宝贵建议。

在演讲交流环节，Pispati 作了题为“Romance of Medicine”的开篇演讲，介绍了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突破性的进展，开阔了医学生的思维和视野。在随后题为“Infection & Immunity: Friends or Foes?”的演讲对中，Pispati 对感染和免疫进行了详细阐述，感染因素既是免疫病的病因之一，也可能成为风湿病治疗的新方向，两者关系密切。Pispati 表示，风湿免疫病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疑难病例多，但其诊治方法发展迅速，不同方向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与 Pispati 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辞海拾英】



这次“习马会”是两岸 66 年来首次领导人会面，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突破。会面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回答了两岸关系走向何方的问题。此外，“习马会”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的动力由协议拉动型转到领导人直接沟通，此次将两岸关系拉高到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谈层面，势必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李义虎教授在“北京大学 2015 年秋季外事系列培训”第二讲为与会者解读“习马会”与两岸关系时说道

▶ 希腊德尔斐山上的阿波罗神庙门前用希腊文铭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中国也有相似的传统文明，如“人贵有自知之明”，而与“认识你自己”不同的是，它强调在人群中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尼采曾说过，离自己最远的人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永恒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很多冲突都来自于怎么看人、怎么做，所以要多看、多想，才能立足于当今社会。

——袁明教授在“北京大学 2015 年秋季外事系列培训第一讲”以《全球化时代，从燕园迈向世界》为题，讲述了宏大背景中或激昂或静慢或闪光或悲怆的人和事，引发北大青年思考大国青年和国际视野的真正意涵

▶ 一首歌通常是先有曲，再有词。先有音乐后有文字。所以作词也叫填词，即把词填进曲中。但是一首歌先有词再有曲会比较好写，因为最漂亮的句子、意象最丰满的段落与音乐风格是配合好的。可是在音乐这个行业里是先有曲，再有词。在歌词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针对某个器皿的了解认识。比如说像青花瓷这种器皿。作品成为大家的记忆里的共鸣，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于音乐人而言，作品变成大家的回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华语乐坛知名音乐人方文山在以《汉字在世界文明中的意义》为主题的讲座中说道

▶ 欧洲一体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确保欧洲乃至全球的繁荣，处于发展十字口的欧盟必须齐心协力迎接挑战、解决问题。欧洲与中国在能源、经贸、环保、教育等领域有非常大的合作潜力，这其中，教育领域的合作能够极大地推进文化交流，有利于增强共识、增进理解，意义重大。

——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在访问北大时发表的演讲中说道

▶ 多元的文化背景是罗德奖学金最显著也是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来自不同的文化、学术、生活背景的人们在一起交换思想，碰撞火花。罗德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对这个世界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所以他们不会局限在自己所学的领域，一个数学家在艺术方面也会有深刻的见解。

——罗德学者魏博乐 (Vitality Voronkov) 在北京大学举办讲座时，谈及罗德奖学金的意义

▶ 欧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比 2001 年的“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更加深重。发生在 2001 年纽约五角大楼的袭击，通常的解释认为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间的冲突。而 2015 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指今年 1 月的“查理周刊”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文明为争取不同理想、价值、宗教而产生的碰撞。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尽管以不同的形式，但对西方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同样适用。欧洲近代价值的衰落以及政治意志的丧失，是欧盟危机的原因及表现。

——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伊夫·夏尔·扎卡 (Yves Charles Zarka) 在北大举行的题为《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公开演讲中指出

时事

CURRENT AFFAIRS



▼ 讲述留学生的“中国故事”

——北京大学举办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发布仪式

▼ 唤醒尘封的记忆

▼ 回首忆朝夕，殷殷寄期许

——北大校友吉米人物专稿

以口述还原历史： 燕园洋弟子的北大记忆

吉米（Jamie FlorCuz）在北大学习和生活的那段往事，在他此次发布的口述实录《我的中国四十年》中，得到呈现。一同发布的还有另外两本口述实录，口述者分别是：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Romulus Budura）及其夫人、罗马尼亚中国史学家萨安娜（Anna Budura）；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白乐桑（Joel Bellassen）。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是曾经求学北大的留学生校友。

人们熟知的是他们在处理对华事务中表现出的中国情结，而其实早在登临世界舞台前，他们的身上早已深烙下了北大所赋予的中国印记，只是年代久远，已很少有人记得，随着此次口述实录的出版，这些尘封的记忆终于被再度唤醒。



讲述留学生的“中国故事”

——北京大学举办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发布仪式

文 / 王伊

随着多功能厅灯光逐渐暗淡，银幕上关于北大留学生历史沿革的帧帧画面变得闪亮——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发布仪式，在百年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隆重举行。

2015年10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拉开了帷幕，而校友口述历史丛书发布活动，作为留学生交流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吸引了众多目光，上级领导及相关部

门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方军、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张宁、国家汉办副主任夏建辉、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出版方北大培文总裁高秀芹，及丛书主编著者之一孔寒冰教授均莅临现场，与学生、学者一同聆听校友故事，见证丛书首发。到场嘉宾还包括丛书之一《我的中国四十年》主人公，CNN前任驻京记者站站长兼首席记者吉米先生及其夫人，以及吉米在历史系学习时的导师王晓秋教授。

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首先致辞，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经过、成果及今后的计划。2018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校庆，为展示北大形象、讲好北大故事、推动北大发展，北大启动了口述史研究计划。北大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北大底蕴、中国情怀和国

际视野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校友取得了突出成就。为此，学校在口述史研究计划下启动了“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出版计划，讲述留学生校友的“燕园情”和“中国故事”。学校每年将出版3至6本留学生校友口述实录，预计到2018年，累计出版约15本图书。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在致辞中谈到，北大因其综合性成为许多留学生来华学习的首选，而留学生校友的口述历史，可以在国际交流中，成为通过特殊渠道传播中国的“好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



他对北大表示祝贺，同时提出更高的期待，希望此套丛书可以译成英语版本，未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口述者代表吉米、编著者代表孔寒冰、出版方北大培文总裁高秀芹分别致辞，介绍丛书整理、出版背后的故事。

本次推出的三本图书分别题为《中罗两国的桥梁：罗马尼亚前驻华大使罗明和汉学家萨安娜口述》，《“黑脚”的汉语之路：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口述》，《我的中国四十年：CNN 北京记者站前站长吉米口述》。讲述了下面几位留学生的传奇人生故事：

罗明 (Romulus Budura) 和萨安娜 (Anna Budura)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留学生——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成员，他们 1950 年来到中国学习，两年后进入北京大学，分别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罗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萨安娜一直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是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学者。

白乐桑 (Joel Bellassen) 1974 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学和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在法国乃至全球汉语教学研究的图景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2006 年，白乐桑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首位专职汉语总督学，他在汉语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大力推动了法国在中学阶段的汉语教学。

吉米 1977 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先后在《时代周刊》、CNN 北京记者站工作，曾担任 CNN 北京记者站站长兼首席记者。吉米采访过江泽民，随朱镕基出访，参加过胡锦涛、习近平的招待会，在帮助世



界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华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他的经历被媒体界的朋友们称为“传奇”。

会上还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丛书发布启动仪式。仪式后，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的赵婀娜主持，进行了对校友吉米和王

晓秋教授的专题访谈，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让在场嘉宾、学者、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校友与北大的往事、他成功的经验和对北大、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与希冀。

最后，伴着吉米动情的话语和热烈的掌声，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发布仪式圆满结束。合

唤醒尘封的记忆

文 / 程阳



吉米： 小宿舍里走出的“传奇”

1971年，20岁的吉米因为菲律宾政局动荡而逗留中国，没想到这一待就是44年，陌生国土变为了第二故乡。在经历了下乡务农与捕鱼务工的日子后，吉米于1977年进入北大历史学系，26楼的346房间成为了吉米在燕园的一个小小的家。

吉米在北大的生活丰富多彩，常在校园参加各种活动，因而很快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北大宿舍楼只有唯一的一部座机，交友广泛的吉米常被传达室的师傅叫下楼接电话，同学们都和他开玩笑：“知道我们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那就是‘346房间，吉米’。”

未名湖畔好读书，最令吉米怀念

的是北大的大师们。求学期间，宋史大家邓广铭给吉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上过邓广铭先生一个学期的课程，有时候教室里几无立锥之地，挤满了虚心好学的同学们。虽然对古代汉语的掌握程度十分有限，有些课程的内容听得一知半解，但吉米还是深深地被邓广铭先生的学人风度所折服。资深学者王晓秋教授对吉米的影响也很大，他帮助吉米学习中国近代史，吉米写成了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毕业论文，时至今日，师生友情更进一步，他们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聚聚，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历史系系统学习的这四年，不仅帮助吉米培养了独立思考能力，也教会了他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吉米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他认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

的现实，就一定要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这一番经历对吉米来说弥足珍贵，成为他未来记者生涯的重要基础。

1980年，已经修完北大必修课程的吉米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新闻周刊》担任助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凭借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和对新闻的敏锐洞察力，吉米从《时代周刊》编外人员一路做到CNN首席记者。

罗明和萨安娜： 燕园走出的中国通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33名同学来到中国学习。和另外3位罗马尼亚同学一起，罗明和萨安娜也通过专修班来到了中国。两年后，他们转入了北京大学。罗明在中文系

学习，萨安娜则进入了历史系。

多年后，在萨安娜写给母校116岁生日的贺信中，她写道：“思绪飘回了1952年秋天，那时候我刚刚踏进北京大学红漆高大的西门。那是金色的秋天，北京显得很特别，天空很高很蓝，甚至远处的西山都看得特别清晰。这个校园的美丽风景和皇家风格建筑，它的宿舍、运动设施，它的热情，还有这里儒雅的教授和热心的同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一开始待在这里我就有家的感觉。然后我在这里度过了梦一般美丽的4年。4年里我学习中国历史，开始爱上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开始明白中国式思维、生活和行为，开始贴近中国人的灵魂根源，开始慢慢确立我作为汉学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理想。现在我刚刚跨过80岁的门槛，我感觉自己仍然是我的母校的一名学生，并且对她给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满足，给予我关于学术活动、快乐生活和生命的一切心怀感激。”

读书期间，罗明对待学习一丝不苟，一直保持着各门功课优秀的成绩。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水平之高，如果只闻其声，很难听出是个外国人。在北京大学，罗明和萨安娜建立了家庭。对待妻子萨安娜，罗明既像严师又像慈父：他经常“检查”萨安娜的学习情况，偶尔看到她贪玩还会给予严肃的批评；更多时候，他会耐心地帮助萨安娜解决学习上遇到的问题，给她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

因为成绩优异，罗明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为中国和罗马尼亚的领导担任翻译，毕业后进入罗马尼亚外交部，专门从事对华关系工作，也因此受到过几代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经历了中罗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重要时

刻。1990年至1995年，罗明出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从北大毕业后，萨安娜一直从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她曾经在罗马尼亚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工作了10年，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成为罗马尼亚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学者。

白乐桑： 结缘中文系门牌上的方块字

白乐桑，这位大名鼎鼎、如今已经成为法国汉语教学研究泰斗的人物，与汉语的结缘其实很偶然。高中毕业后，白乐桑进入巴黎第八大学主修哲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学习第二专业，他便选择了西班牙语，因为感觉太简单，于是不再学习。他偶然间看到了学校中文系门牌上的汉字，立刻被这些奇妙的方块字深深吸引了。自此，他的一生便与汉语、与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多年后，白乐桑回忆道：“如果没有汉字，我肯定不会学习汉语。”

白乐桑对于“学”“识”的真挚追求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异常充实地完成了留学生活。“学”来自北大校园的读书生活，而“识”则更多地源于与中国同学、老师的交流，深入中国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的经历以及在中国城乡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

毕业后白乐桑长期在中学和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在法国乃至全球汉语教学研究的图景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白乐桑先生耕耘的身影。世纪之交，白乐桑先生担任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对外教学法领域的教授及研究生和博士生导师；2006年，白乐桑教授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首位专职汉语总督查，他开始更加全面地指

导法国汉语教学工作，他在汉语的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推动了法国在中学阶段的汉语教学。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建交50年50人”的评选活动中，白乐桑荣列榜中。

无法忘怀的北大情

像罗明和萨安娜夫妇、白乐桑、吉米这样从未名湖畔走向国际舞台的优秀留华校友还有很多。据统计，从北大走出的国际校友中，担任所在国家部级以上官员及驻华大使的超过50人，活跃在当今汉学界的大批汉学家和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都有在北大留学和从事研究的经历，还有更多的国际校友从事教育科研、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经贸合作、新闻媒体等领域的工作。

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Mulatu Teshome Wirtu)，曾在北大完成了他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他对中国、对北京大学有深厚的感情，就任总统后，在访问中国期间，他还专程抽时间回到母校，看望老师朋友，与他们一起畅叙友情，分享美好的回忆。李克强总理到埃塞俄比亚访问，赠送给他的礼物是北京大学的画册，很多媒体说，这是“师兄弟”会面。

德国著名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在北大学习多年，她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她为代表的北大培养的汉学家，热爱中国、理解中国，为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今，她担任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的院长，长期致力于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

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斯塔法·萨法日尼(Moustapha Saphariny), 先在北大学习汉语, 后来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之后多年担任驻华大使。他和其他许多在华担任外交官的校友一起, 为中国和他们所在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付出了许多努力。多年来, 他还坚持从自己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 为母校开设阿拉伯语课。

塞尔维亚“东方之家”的副主席玛丽娜(Pop-Cenic Marina), 20多年来精心耕耘, 为中塞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4年12月, 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时还接见了她。玛丽娜曾这样讲: “我觉得, 我既是塞尔维亚人, 也是中国人。北大就是我的家。”今年访问母校期间, 她提出以后将在“东方之家”的网站上开设“北大之窗”, 帮助更多的塞尔维亚学生认识、了解、申请北京大学。

吉米先生毕业后长期在中国工作, 作为一位外国媒体驻华记者,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真实、准确地向国际社会介绍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果。吉米一直关注和参与母校的发展, 2010年, 北京大学国际校友联络会成立, 他出任首任会长, 在他的组织下, 留学生校友积极参与母校的各项工作, 从多方面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今年, 吉米还把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贵书籍捐赠给了母校。

用口述留存历史的声响

一批批留学生校友从北大走出, 他们讲述并书写着中国的故事、北大的故事, 他们的经历、成就、思想与情感, 都在帮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 and 认识中国, 也在帮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他们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些历史的回响需要被记录、保存。因此, 用口述历史的形式, 收集和整理北大来华留学生的留学记忆与中国故事, 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生动的记录和个人化的叙事, 不仅是对宏大历史的补充, 也

是十分宝贵的史料, 必将有助于系统梳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和人才培养成果, 也为理解新中国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历史, 提供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

一直以来, 北大都非常重视留学生校友工作, 做好校友联络服务工作的同时, 也注意总结梳理开展留学教育的经验, 并以出版物的形式整理留学记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 北大就曾出版了反映留学生学习生活的画册及录像带《海外学子在燕园》。其后, 以110周年校庆和纪念新中国接收外国留学生60周年为契机, 又先后出版了《红楼飞雪: 海外校友情忆北大》和《燕园流云: 世界舞台上的北大外国留学生》两本文集。这些出版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来华留学生的风采, 其中蕴含的理念、梳理的历史、总结的经验也已经成为北大外事工作者重要的积累, 而且还在全国高校以及海内外几十万北大校友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还有3年时间, 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华诞, 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节点上, 北大正式启动了“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计划”,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留学生校友中有代表性的人士进行访谈, 记录、整理、出版他们的故事, 为历史留下一部分底稿。有理由相信, 随着这份工作的持续开展, 众多来华留学校友的精彩人生将因此定格, 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写下难忘的篇章。合



北大求学时的吉米



回首忆朝夕，殷殷寄期许

——北大校友吉米人物专稿

文 / 王伊

百周年纪念讲堂的观众席上，每个人都在侧耳聆听，聆听他的故事，他的声音。舞台暖黄的灯光下，他的面容格外温厚平和，并说着一口流畅的中文；然而四十多年前，他还是个年轻不羁、精力无限的异乡小伙。如今的他是 CNN 驻京记者站前任站长，也是北京资历最深的国际记者，亦是北京大学国际校友联络会的会长，履历精彩，光芒万丈；然而四十多年前，他却是个滞留中国的菲律宾流亡学生，踏进燕园，只是机缘。他就是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发布仪式上《我的中国四十年》的主人公，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吉米。

风从海上来，游子落燕园

64 年前的一个春天，吉米出生在菲律宾马洛伦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成为家里第五个孩子。少年时代的吉米活泼好动，成绩虽不拔尖，但是在课外活动中有着极为出彩的表现。他自己曾开玩笑道：自己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课堂以外收获的。

中学毕业后，吉米先是考入了一

所教会主办的私立男子大学，这所以优良的教学水平和高昂的学费著称的大学，接收的大多是官宦子弟和富人家的孩子，出身中产阶级的吉米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一年之后，他毅然决定退学，并转入公立菲律宾商业大学（后更名为菲律宾理工大学）学习。适宜的环境和氛围成了吉米迅速成长的沃土，他成绩优异，又担任了校学生会的干部，并且成为了学报的总编辑。走马上任后，吉米对学报进行了深入改

革，将刊物名称由 The Businessman 改为菲律宾语 Ang Malaya，意为“自由”（The Free）；同时，吉米和他的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学报的视野从校内事件拓展到了社会层面。他们借助于这个平台进行独立的思考，发出自由的声音，将更多青年学生热切的目光引向时政。

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吉米的大学时代，恰好赶上了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对菲律宾的统治时期。马科斯家族独裁和腐败，政策不合理，导致了物价上涨、土地问题、学术自

由受限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加上反越战的国际浪潮，使得二战独立后还在成长中的菲律宾成了一口混沌的高压蒸锅，时刻酝酿着爆发。终于在 1970 年，菲律宾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而吉米也从时政的关注和播报者，变成了先锋和参与者。他所领导的全国大学记者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罢课游行活动，或许天真，或许莽撞，但却是青年们渴望参与和改变国家现实状况的先声。

“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国际记者，我不是美国记者，也不是中国记者，我就是吉米。这是我们做新闻的任务和责任。”

然而反抗浪潮换来的是政府的漠视和冷酷镇压。就在吉米彷徨于祖国的未来之时，一份来自“红色大陆”的邀请，使他结缘中国，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却也因此翻开了传奇的人生新篇章。

70 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文革的狂飙突进，又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宏伟大计。吉米就是在这个历史夹缝时期接到了中国友协的邀请。当时在菲律宾，往来中国是违法的。然而对比当时民

不聊生、统治者独裁专断的菲律宾，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吉米看来，是那样神秘而浪漫。浓浓的好奇心和年轻不安分的因子驱使着他和几位同学一起踏上了为期三周的中国之旅。

但是令吉米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归音杳杳不可期。他们访问中国期间，菲律宾政局翻天覆地，马科斯总统以马尼拉一起爆炸案为由实行戒严，并逮捕了包括学生运动领袖在内的几百人，吉米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之后的社会动乱愈演愈烈，从1971年直到1983年，整整十二年，吉米的护照早已失效，他就这样成了滞留中国的无国籍人士。

吉米被迫留在中国时，正值上山下乡的大潮。在那个敏感时期，作为外国人，他们在中国人大学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1971年冬天，吉米一行被安排在湖南湘江农场下乡。下乡时期，吉米上午干农活，下午跟随翻译老师宋明江学习中文，日子简单平淡而真挚温暖。1972年，他又被安排到山东烟台渔业公司工作，从农民变为工人。吉米很快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和他们谈天说地锻炼汉语口语，同时也读了不少中文读物。

1974年，中国政策逐渐松动，吉米一行于春天再次回到北京，并于同年秋天进入北京语言学院正式系统地学习汉语。时间一晃就到了1977年，在这转折性的一年，文革冲击下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吉米也通过专门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农民、工人之后重拾知识青年的身份，终于成为未名湖畔的一名北大成人。

吉米初入北大时，中国“中外有别”的观念还很根深蒂固，老师们对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日常交流还设有一

定心理防线，本土学生对于吉米他们也是既好奇又防备。拥有独立食堂、可以无限购买饭票等特殊待遇也为吉米的融入带来了阻力。但是吉米依然活跃于社交，他真诚待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社团活动——有一面他和篮球队同学代表北京在第一届全国男篮比赛上赢得的锦旗，尽管已然老旧，却还是被吉米一直珍藏着；他说，这是他亲爱的队友们托他保管的。除了活跃在北大校园，吉米还和同学一起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走遍中国大江南北，一方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风土人情，一方面也努力把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关系推向开放和融洽。

读罢圣贤书，亦怜窗外事

学校对于吉米来说，从来就不只是学术的象牙塔。他在北大求学的过程，既是对他在菲律宾经历的延伸拓展，也是不同文化环境下独特的新体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时代的岔路口，关于坚持“两个凡是”还是进行思想解放的争论如火如荼，而北大就处在新旧思潮交锋

的前沿阵地。

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是这里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带着一如从前对时政

的满腔热忱，吉米开始在学习的同时，体悟历史与政治间的微妙关系，逐步形成了自己看待政治的独特眼光。可以说，北大是助他在日后的记者生涯里大展宏图的一阵东风。

在燕园读书时，最令吉米敬佩和

神往的，就是燕园大师们的学者风范和翩翩气度。历史系的近代史大家王晓秋先生作为吉米的毕业论文导师，就曾经给吉米带来深远的影响。他是吉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引路人。

除了本专业的老师，吉米还接触了各领域的大家。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北大中文系教师）时常邀请留学生们到家里聊天、探讨问题。他们的热情给了吉米这样的异乡人极大的温暖，而他们就当时的政治问题所做的思考，也给吉米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吉米回忆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迁，历史教学内容也在不断修改，“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学习了四套中国史”。而老师们的教学方法和学术讨论形式中，政治色彩也在逐渐淡化，那种分明学术与政治，力求对历史评价客观公正的学术风骨，使吉米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他更加理解了历史是政治的源头和基础，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解，使得他在日后向世界报道中国问题时，

能够加以历史

背景的补充和来龙去脉的梳理，做其他外媒记者做不了的事，从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除了培养

学术能力，吉米探索社会的脚步也从未停息。从兼职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粉刷匠”，到做英语专题栏目的录制嘉宾，再到英语口语老师，最后终于一头撞进了媒体行业，一干就是一辈子。吉米从《新闻周刊》不起眼的助理做起，

很快他大学期间积累的人脉和培养出的时政敏感性，就为他赢得了青睐。他得到了第一个采写新闻的机会——报道审判“四人帮”。如此重磅的敏感新闻对于一个还没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吉米还是尽全力调动已有的资源，收集已有的中国平面媒体报道，参考同学从身边渠道获得的消息，每晚守着电视关注审判进展，为的就是客观、准确、及时地完成新闻采写。最终这次报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最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吉米日后从业新闻媒体数十年始终坚守的信念——“既要尽快把真实报道传递出去，又不能把主观臆测带到自己的报道中”，新闻的力量就来自于时效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从《新闻周刊》非正式记者，到《时代周刊》顶梁柱，再到CNN的首席记者，他都没有忘记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责任。作为驻京的外籍记者，在中国较为敏感的舆论环境中，吉米的报道也曾遭受过很多非议，比如涉藏事件报道被指有失偏颇等等，对此他表示，能够理解很多批评者的感受，但是他们提的问题或许尖锐，却并无针对性，只是为了履行记者的义务——报道真相。他说自己始终如一地秉持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如果说可能有任何偏向的话，那就是会偏向弱者，为弱势一方更多地发声——“让不舒服的人过得舒服，而让高

枕无忧的人烦恼”，吉米笑说这就是新闻人的工作。

回首忆朝夕， 殷殷寄期许

流光容易把人抛，转眼间四十载光阴流转，吉米功成名就，履历精彩无比。然而从新闻一线退下来的他，依然担任着北京大学留学生国际校友的会长，也乐于将自己的经历和心得与莘莘学子分享。到头来，岁月冲不淡的，还是浓浓燕园情。

吉米曾经对北大的岁月非常感慨：“能有机会上北大，我觉得很幸运。很多中国朋友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都很惊讶，他们把北大看成是一所很值得尊敬的学校。所以，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这样的经历是一种财富。”

据他回忆，“在刚刚踏入北京大学校园的时候，对北大的传统和历史只有比较模糊的感受，当时并没有关于北大精神的明确论述”，但是它却在四年的生活点滴里不断渗透，烙印人心。在他的记忆里，北大学子追求知识，也勇于担负社会责任感；他们有着青春的锋芒、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也有着独立、自由、大胆、创新的理性思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欢迎“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些既是北大的“老传统”，也应该是北大的“新精神”，或许更进一步，该是朝气蓬勃的中国和她孕育的有思想有道德的知识青年所

吉米

Jaime A FlorCruz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77级校友。1951年4月5日生于菲律宾。曾在《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工作近20年，2001年转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曾任CNN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

1971年，吉米作为菲律宾学生代表团成员在中国访问期间，因国内政变，无法回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他的经历可谓传奇：1977年在北大留学，与学生会干部李国强同期就读，1982年开始记者工作，报道江青自杀他比新华社早了好几天；33年的记者生涯，他采访过江泽民，随朱镕基出访、参加过胡锦涛、习近平的招待会，也采访过春运返乡的农民工和投诉拆迁问题的上访者。吉米在中国待了近44年，先后见证了中国5任领导人，也目睹了中国的巨变。

共有的新精神。

四十年的中国生活，使得吉米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无法言说却也无法割舍的感情。有时候他会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初到这片红色土地时所见的景象，言语间充满怀念——对于一个菲律宾少年年轻的心来说，那时的中国纯粹而浪漫，令人神往。而提起四十年后的中国，吉米承认站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他目睹了很多社会现实问题，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的未来怀有美好热切的期待。

而北大精神强大的精神内核，曾经驱动着吉米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新闻人，追求真理、关注现实、客观公允又不乏悲悯和人文情怀。而如今，吉米希望它能够驱动更多的北大学子，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崛起进程中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希望他们能够让“中国在变得更强大的同时，能够始终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对世界起到正面的影响”。

尽管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吉米觉得他还是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却和中国，和北京，和北大结下了天长地久的缘分，用他的话来总结，就是“困在中国、长在中国、胜在中国”。假若有一天离开这里，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吉米恐怕会深深地害起相思，想念他的母校、他的老邻居、他热爱的美食和已成习惯的生活，当然，还有那些完全接纳和包容了他的老朋友们。合



“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

——北京论坛（2015）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京城迎初雪，四海共天涯。伴着今冬的第一场雪，11月6日上午，第十二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拉开序幕。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本届北京论坛主题设置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旨在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学术发展，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文明的繁荣进步作出贡献。400余位中外嘉宾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



朱善璐书记致辞

朱善璐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是大家的一致追求，这不会因道路选择与文化差异有所分歧。当前人类社会的文化、文明与价值观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回答和应对这三者的冲突与发展中寻求新的和谐，是全世界共同思考的问题。北京论坛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以文明与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自2004年创办以来得到中国政府与国际学界的大力支持与高度关注，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论坛主题下，保持特色并与时俱进，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学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在致辞中对北京论坛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了肯定。他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沟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教育无疑能够发挥文明传承与创新、沟通与互鉴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教育部愿意与世界一道，以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为实现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而携手努力。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致辞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伊克巴勒·里扎致辞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Iqbal Rizza）宣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约瑟夫·里德的贺信。里德在贺信中表示，当今世界，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依然存在，这需要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来创造更加和谐的世界，而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北京论坛则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平台。里德进一步指出，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努力和平解决冲突、争端，“联合国在避免和预防下一次世界大战上是成功的，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更加危险”。他还强调了联合国在结束种族隔离、建立国际法、保障人权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视频致辞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视频致辞，肯定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所作的努力。他表示：“联合国旨在让所有人过上更加体面舒适的生活，消除贫困和缔造和平秩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帮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脱贫，也成功激励了世界其他国家，而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于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大会，潘基文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消除贫困、维护人权、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条件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未来。



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致辞

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粮食安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亟待解决。面对这些重大全球性议题，我们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这方面，不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项目将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北京论坛更是提供了一个文明对话与合作交流的有效平台。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发表演讲

北大校长林建华代表北京大学对与会嘉宾和学者的光临表示欢迎。他指出，北京论坛坚持站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制高点上讨论地区和文明间的和谐与冲突，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回应。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考验，其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北京论坛致力于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重要问题和未来走向，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林建华向长期关心北京论坛建设和发展、给予北京论坛支持和关注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北京论坛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 - 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发表特邀报告

在随后的特邀报告环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 - 阿盟叙利亚危机前联合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 (Lakhdar Brahimi) 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现实还是幻想”的演讲。他提到，中东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类的和谐相处离不开中东的稳定。我们应该坚持多边主义的策略，摒弃冷战思维，相互借鉴，和谐共存。世界文明多种多样，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交流、互鉴、融合、合作才是正确的道路。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朴仁国致辞

本届开幕式的主旨演讲环节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主席柯伟林 (William C. Kriby)，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帝文·邓 (Stefan Dercon)，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钱乘旦分别发表了演讲。

柯伟林作了题为“中国教育是否领导世界”的主旨报告。他从中国的近代史谈起，认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中国的教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备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袖的潜质。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解放自我，大学需要空间来给予思想进行自由的提问和争辩。他期待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主席柯伟林发表主旨演讲

斯帝文·邓（Stephen Deng）结合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分析了全球和部分国家的经济状况，指出贫困问题在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都依然存在。他分析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结合自己参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援助案例，详细介绍了人道主义援助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自然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风险机制和全球人道主义系统的建立来缓解，充分发挥政府和非官方组织机构的作用，避免让极端事件发展为灾难。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帝文·邓发表主旨演讲

钱乘旦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多样化与现代化的未来”的报告，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钱乘旦回顾了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两河流域、古埃及的大河文明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各有特色。谈到古代中国的发展，钱乘旦认为，文明具有两个载体，即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政治上的统一与孔子学说的完美对接成为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原因；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的分离使得欧洲中世纪成为黑暗的时代；而以民族共同体为物质载体、民族认同感为精神载体的现代国家使得近代西方重新崛起。钱乘旦又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崛起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冲击，但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多样性文明开始复兴。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文明优越论”不利于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多种文明只有共荣才能共存，文明多样性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钱乘旦发表主旨演讲

“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创始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理事长、高丽大学校长廉载浩也出席了开幕式。

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有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位名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致力于推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共性问题的研究，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届论坛为期三天，共设五个分论坛，两个专场和一个学生论坛，分别探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社会创新、艺术史、城镇化、国际关系与生态保护等议题。合

独家

策划

SPECIAL REPORT



全球青年
创新之夜
GLOBAL YOUTH
INNOVATION FESTIVAL
共赴北大的约定

▼ 青年引领未来，创新拥抱世界
北大“全球青年创新之夜”活动隆重举办

▼ 科技·市场·未来：青年创业团队面面观

▼ 创客说：有志初创，业以不辍
——“全球青年创新之夜”侧记



2015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重要高潮环节“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峰会”和“全球青年创新之夜”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用智慧和热情点亮当晚的夜空，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与艺术交相辉映”的“创新之夜”。本次全球青年创新节为大家呈现的，不仅是最性感的科技沙龙、最尖端的核心技术、最新锐的创业构想，还有北京大学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精神。无论是对当代大学生，还有科技产业、向创新时代迈进的人，青年创新节都让他们看见未来，赞叹未来；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能够坚定信念，在今后的科技展览中带来更多的创意产品。



青年引领未来，创新拥抱世界 北大“全球青年创新之夜”活动隆重举办

10月25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重要高潮环节“全球青年创新领袖峰会”和“全球青年创新之夜”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10月25号下午，峰会主论坛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开启，主论坛由校团委书记阮草老师担任主持人。首先，由北京大学高松副校长、山东省青岛市王广正副市长分别致辞，并陈述了校地双方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Xtecher 创始人戚宗超作为本场会议的主办方在之后发言。随后国际生产工程学院院士卢志扬教授发

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对教育和创新，国家创造的未来进行了精彩的讲述。

本次峰会在主论坛之下设两个分论坛，分别为“领袖篇·全球视野与未来领袖”“创新篇·创新趋势和社会价值”。分论坛一由北大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海霞教授担任主持。克隆及分子生物学专家，美国肿瘤研究院资深科学家，美国基因检测公司（AGTC）创始人 Juliet Luo 博士、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的“杰出成就奖”获得者曾宪章教授、晶泰量子科技（Xtalpi）联合创始人赖力鹏博士、Microduino 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镇

山、Dobot 机械臂平台创始人刘培超针对青年创新和培育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论坛二由北大艺术学院党委唐金楠副书记主持。出席的嘉宾有知名意见人王冠雄先生、SAP 大中国区商业创新首席架构师鲁百年博士、法国欧瑞泽基金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总裁陈永岚先生、“跟谁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新东方前执行总裁陈向东先生、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Noitom Ltd.）品牌副总裁陈楸帆先生、当代花艺艺术家，花田小憩植物美学分享平台创始人曹雪先生。各个领域的前辈针对北大学子提出的有



关青年创业和职业规划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指导为参会的北大学子提供了更多新颖的视角。

会议最后，在众多嘉宾的见证下，2016国际大学生 iCAN 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峰会邀请到众多世界级创新创业领袖和各国青年创业者参加，汇聚全球创新创意项目和优质资源，让世界顶级学者专家、企业家与年轻人直接对话，深入探讨创新创业发展趋势、创新创业与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青年创业领袖成长等主题，并通过本次峰会打造世界一流的青年创新创业平台，向全球青年创业者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当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的“全球青年创新之夜”，是2015年“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闭幕式，也是“全球青年创新节”的优秀项目成

果的展示和颁奖盛典。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国高校的12支代表团队，在 Xtecher 全球科技创新创业平台的大力支持下，从全球12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在百年讲堂的大舞台上精彩演绎了他们的创新成果。我国著名主持人和创业者张泉灵女士担纲主持，国际知名

创新教育专家卢志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著名教授饶毅，金联储公司创始人、北大校友王宇宏，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杰出成就奖”荣誉获得者曾宪章，“跟谁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向东担任评委。此外，现场还有101位来自十几个院校的青年创业评审，点评犀利、妙趣横生，





为全球青年学子打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国际创新创业盛宴！最终来自斯里兰卡的“触摸希望”团队获得冠军，摘得首届全球青年创新金奖；来自美国的“H3 智慧牙套”团队和中国的“奇妙旅行”团队共同获得全球青年创新银奖。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用智慧和热情点亮今晚夜空，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与艺术交相辉映”的“创新之夜”。

本次全球青年创新节发源于北大的“国际文化节”、“国际大学生iCAN创新创业大赛”和“CCFL未来领袖文化创意大赛”，以“青年引领未来，创新拥抱世界”为主旨，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创新创意项目，连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与“青年创业”三大要素，集成各类优质资源，为青年学子提供国际化的创新创

业交流展示以及培育和宣传机会，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平台。同时，让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青年一代的创新创业能力，也让中国有机会吸引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人才，开启全球化的创新创业模式。

作为创新之夜的最强音，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在大赛后宣告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全球青年创新创业联盟。高松副校长表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幕拉开，北大学子率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之中，发起倡议，五大洲近百所世界著名高校的创新创业类青年及社团组织参与其中，各国优秀的青年创新领袖一定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发现更多的市场机会，通过智慧碰撞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打造一个属于青年人的国际化创新创业交流平

台，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正在造就一个属于创业者的辉煌时代。作为国内顶尖学府的北京大学，北大学子已率先投入创新创业的行列中，并卓有建树。本次创新节得到了金联储公司创始人、87级北大校友王宇宏的慷慨捐资，对于母校建立创新实践基金的大力支持。同时，本次活动也得到了全球科技创新平台 Xtecher 的鼎力相助。同时，在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探索最新前沿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创新方面，北京大学也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北京大学的致力于为进一步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精神，增强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帮助青年创业者实现资源融合的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我国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合



科技·市场·未来：青年创业团队面面观

文 / 胡慧迪

10月25日，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高潮环节“全球青年创新之夜”在北京大学百周年讲堂隆重举行。本次创新之夜以“青年引领未来，创新拥抱世界”为主题，连接“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与“青年创业”三大要素，汇聚了从全球12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的来自中美韩日等国的12支创新创业团队。经过三个环节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斯里兰卡的“Touch of Hope”团队获得冠军，摘得首届全球青年创新金奖；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H3智慧牙套”团队和“剧”变80后的“奇妙旅行”团队共同获得全球青年创新银奖。

“ 我们对新人的要求是
‘又红又专’ ”

技术创新类的项目，“H3智慧牙套”是创新之夜中非常吸引观众的

一个产品。它的创意来源于学校牙医与指导教授的一次闲谈。这款“智慧牙套”不仅可以监测运动损伤，进行个人健康管理，还可以监测佩戴人晚上睡觉时是否会“磨牙”。目前，这个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创客团队里除了教授和牙医，还有两个博士生和一个本科生：“我们的教授负责项目的总体指导，学校的牙医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和背景知识。博士生主要负责具体的项目构思和硬件开发；本科生则负责编程和软件开发。”“我们团队的成员基本上来自同一个实验室，每周都会一起参加实验室的组会，偶尔也一起聚餐：彼此之间感情非常好，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也是毫无隔阂…当最终克服技术难题把关键组件做小之后，整个团队都十分兴奋，还一起去酒吧庆祝了一下。”谈到对创业者的建议，Wang Feng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有（用技术）解决问题的决心。在研究过程中，要有耐心和毅

力。”确实，唯有长情和信心才能促成成功。

对于对团队成员的要求，来自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高南荣博士也有自己的看法。高博士致力于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与朋友进行公益创业，创立了采一（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接受采访时，高南荣表示“采遗网”的创新灵感来源于自己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经历：“那些地区的文化底蕴是很‘厚’的，可是那里的人们却很贫穷。（老师傅）招不到徒弟，那些老手艺就只能失传了。”基于这种亲身感受，“采遗网”创业团队致力于为非遗传承人或传承单位提供申报项目、市场交易、经纪代理、传承保育、品牌推广和海内外文化交流等市场服务，并且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对这些“非遗”产品进行营销。“我们要打造‘非遗’产品的天猫。”高南荣如是说。

“采遗”公司创办于2012年，

核心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我们团队里有从本科生开始做的，到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也有从研究生开始做，然后到现在因为创业博士毕不了业，我自己就是这样（笑）。”谈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高南荣不假思索地表示最大的困难就是“招人”：“我们对新人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红’，是指对项目抱有热情，对团队能交付忠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创业品质；‘专’，是指了解专业知识，个人能力可匹配团队角色，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创业能力。‘红’在‘专’的前面。我们需要真正有创业精神的人才。”

“——
关注市场
——”

“回车科技”团队创始人的樊钰出场时头戴一个极富未来气息的脑电采集设备，而他所属团队的项目——一款用脑电波控制的“意念赛车”也确实给人一种科幻世界的即视

感。不过，樊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酷玩脑电波”的创新初衷其实是为了帮助残疾人，而创新灵感则是来源于一部电影中植物人通过脑电采集设备与家人交流的情节。“但是通过实际的市场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的市场条件还不足以支持这样一款（运用脑电波技术帮助残疾人的）产品的研发生产。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些更吸引眼球的小作品，比如这款赛车，来促进人们对于脑电波控制技术的了解和兴趣……当市场接受度足够了，（设备生产）成本也降下来了，我们才可能实现自己最初的想法。”

目前，“回车科技”团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浙江大学理工、经济、中文等不同专业的“90后”。“平时我们也会一起去爬山，唱KTV之类的联络一下感情。”对于将来希望走上创业道路的理工科同学，樊钰的建议言简意赅：“关注市场。”

作为一个艺术创新团队，

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国际文化节暨全球青年创新节的高潮环节“全球青年创新之夜”以发源于北大的“国际大学生iCAN创新创业大赛”、“CCFL未来领袖文化创意大赛”为基础，汇聚来自全球的创业项目，集成各类优质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的青年创新创业平台，为各个创新团队提供了国际化的创新创业交流展示以及培育和宣传机会。这次活动让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青年一代的创新创业能力，同时也让中国有机会吸引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人才，开启全球化的创新创业模式。

“剧”变80后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剧组负责人直言不讳：“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过我们也一直相信，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项目的最初我们是用自己的钱支撑（项目运行）的，后来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和我们志同道合的投资人。”“目前我们在把剧组的一些核心作品商业化，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也有所控制。但不该省的地方我们绝对不会省。比如我们剧组今天的服装，就是圈里最好的裁缝做的，这个是看得出来的。”

谈到给艺术创新团队的建议时，剧组财务人员特别强调了团队成员互补的重要性：

“（艺术创新团队）既要有艺术追求，也要脚踏实地。团队互补很重要，有时候成员的意见太过一致，团队反而容易走偏。比如在我们的团队里，我就扮演了一个类似于‘锚’的角色。因为在加入剧组之前从事的是资本市场相关职业，我对可能的筹资渠道十分熟悉，而这对于解决我们团队的资金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创业的路途不会一路平坦，“剧”变80后依然执着于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本次“创新之夜”上，其打造的中国首部“全体验”家庭舞台系列剧《奇妙的旅行》以其欢快动感的舞蹈、鲜艳精美的服装捕获了全场观众的眼球。该剧的创新灵感来源于剧组组织的一个在周六日举行的家庭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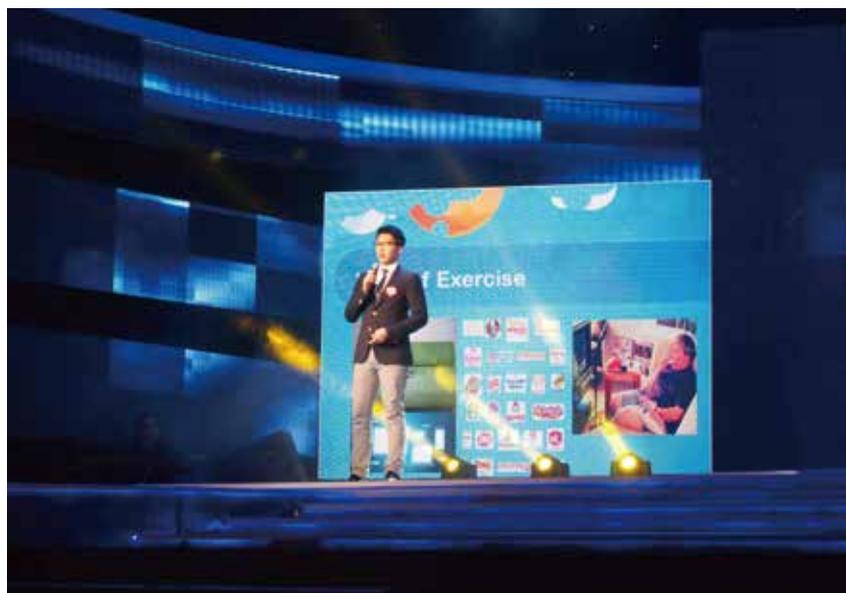


体验活动和自己做艺术教育工作的经历。“我们喜欢儿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一些面向少年儿童的艺术作品往往不尽如意，没有童趣。我们希望能做出一些价值观正、能教导儿童追求美的同时又有趣味性，贴合实际的作品。我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适合整个家庭一起观看，让儿童从中看出童趣，家长从中看出艺术。”

“ 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想法 ”

一个优秀的创业团队，除了需要成员间极高的默契，还需要领导者卓越的判断力和对创新点的把握，“Touch of Hope”项目的创始人，来自斯里兰卡的贝曼（Biman Najika Liyanage）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整个项目的发起策划和技术研发都是由团队领导核心一力承担。这位一带一路国家的精英毕业于工程类专业，同时对经济和商务也有所涉猎。这款名为“触摸希望”的创新产品致力于加强盲聋儿童之间的互动，采用交互媒体的方式着重培养盲聋儿童对颜色、尺寸等物理特性的识别，增强他们的沟通能力与了解周围环境的能力。其创新灵感则来源于一部名叫《黑色的风采》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盲聋哑残疾女孩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细节深深地触动了贝曼：“我意识到盲女孩（拒绝移动）其实是因为惧怕（家人为了提醒她所处位置而悬挂的）铃铛的响声，因为这种响声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不能从这响声里获得周围事物的信息，只能徒增恐惧。于是我希望做这样一款产品，能将周围的信息以另外一种方式传达给这些残疾儿童，在他们心中种下希望。”

在谈到给创新团队的建议时，贝



曼再三强调：“市场营销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有影响力，这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你有一个想法，你需要正确地传达你的想法。这就是创业的秘密。”至于想法从何而来，贝曼表示：“想法来自于经历。你需要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一起‘浪’，需要和那些创造过奇迹的‘大牛’交流。我的朋友中有人在落后地区献身于救助艾滋病人，有人致力于促进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有人在谷歌公司通过编程改变世界。当你的社交网络持续地扩张和深化，你身边的榜样会持续地激励着你进行创新，想法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认为想法背后的关键就是灵感。每天早上我都祈祷上苍，让我在这新的一天里获得新的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源于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是一张油画，但最重要的是要一直保持寻找灵感的状态。”

他同时表示了对北京创业环境的欣赏：“北京的研究者们十分友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比如我的大学时的导师 Chen Jie 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宁静的，自由的地方，可以让我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于是我在这里做我能做的，做在这里能做的。”号称“万能”的淘宝也给贝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淘宝上我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所有需要的东西，从电子芯片到3d打印设备。”“淘宝上电子芯片的价格是如此便宜，以至于我可以在做研究时随意烧坏几块（笑）。”谈及未来，他的回答是：“努力工作以待假期，努力准备以待未来。”

现代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得有言：“创新应当是企业家的主要特征，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道赚钱、存钱的守财奴，而应该是一个大胆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开拓的创造型人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一波波创业的新浪潮正在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今夜过后，又有多少青年才俊将走上创新创业之路？也许十年之后，也许明天就会见分晓。

合

一个对周遭事物有热心的人才会更容易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不冷漠的人。这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国际生产工程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世界课堂创始人
卢志扬

互联网领域核心的竞争恐怕已经结束了。未来互联网将不仅仅是一个新兴事物，而是像水和空气一样的普世性的工具，对一切领域产生影响。

——知名主持人、创业人张泉灵

创客说：有志初创，业以不辍

——“全球青年创新之夜”侧记

记者 / 陈则尧 陈星任 组稿 / 艾新雅

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公开场合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一年多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的减速换挡，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而新的国际经济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这也对新常态下的创新创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呼声之下，北京大学肩负着引领创新创业大潮的光荣使命。作为北京大学“全球青年创新节”的

重要部分，创新之夜邀请到了众多世界级创新创业领袖和各国青年创业者参加，汇聚全球创新创意项目和优质资源。世界顶级学者专家、企业家与年轻创业人对话，深入探讨了创新创业发展趋势、创新创业与社会价值以及青年创业领袖成长等主题，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青年人关心的创新创业问题。大潮之下，众多前辈、学者齐聚一堂，为青年创新创业发展深思、守望。

1. 创业者： 在琐碎与压力中 坚定地走下去

陈向东先生首先阐述了创业者必备的三种品质：第一是发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的趣味；第二是百折不挠，接受各种打击不放弃；第三是具备动员更多人加入与跟随的能力。美籍克隆及分子生物学专家罗朱莉（Juliet Luo）女士和卢志扬博士则主要从科研和创业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罗女士



认为科研是创业的基础，创新是科研基础上的行为，只有良好的专利保护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创新行为。卢志扬博士则认为做科研和创业创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做科研需要知识，而创业创新需要见识。创业成功的人不一定在知识上能够超过别人，但一定存在与别人不同的见识。

关于抗压性，张泉灵女士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她选择在42岁这一事业的上升期离开央视，离开原有的稳定职业，投身创业重新出发。谈到这两段生活的种种不同，她笑称过去常常是别人追着她给钱，现在更多的是她在后方以投资人的身份对项目进行注资。但这些表面的差异之外，其实是重新对人生路径和方向的确立。她曾在离职后的长微博《生活的后半段》里写到，选择创业是“不满足于好奇心和独善其身”。离开原有的平台，放弃曾经的依托，遇到困难时创业者可以依靠的人只有自己，因为也许会遭受来自亲人下属和投资人的不理解，在这种情形下抗压性作为创业者素质之一，就显得尤为重要。

常言道“双拳难敌四手”，“一个好汉三个帮”，创业往往不是孤胆英雄的单打独斗，不同人才的通力合作才能组成一个团结而有战斗力的创业团队。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往往使得创业团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在某一阶段失去方向感，团队内部出现矛盾，

团队构成存在短板等等。针对这些问题，陈向东先生认为，每个创业团队都必须清楚地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意识到这些问题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团队中。一旦发现短板，投入时间并向导师寻求帮助，就像Facebook请了施密特担任导师，由此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另外，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创业团队的要求往往是不同的，但是只要在其中的一个阶段做到极致就是创业者的胜利，而非面面俱到。概而言之，不要恐惧担忧自己哪个方面不如别人，要想到在这个方面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最极致的状态，而有些时候创业更需要的是顺其自然。

2. 创新创业在中国： 进步可喜，教育优先

当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言论常常见诸报端，以华为、小米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更是让人看到了中国创新能力的美好前景。巨大的进步让人振奋，但是，存在的差距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陈向东先生认为中国青年创业创新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从2014到2015年的新一轮的创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中国影响到了国外，而非以前的从国外引入到中国。换句话说，在当前新一轮的创新创业大潮，个人梦想被激发的过程中，中国的竞争创业一点都不输于国外。

陈向东

跟谁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前新东方执行总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商学院校友，数家高校的兼职、客座教授。1999年年底加盟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2002年创建武汉新东方学校，2003年10月任集团副总裁，2006年任集团高级副总裁，2010年11月任集团执行总裁，全面负责集团管理工作，2014年1月辞任新东方执行总裁职务。2014年6月，创办“跟谁学”。

张泉灵

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原央视主持人。1997年考入央视国际部，并任《中国报道》记者、编导、主持人，2000年任新版《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及《人物周刊》《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栏目主持人，2010年获得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2015年7月上旬，张泉灵确认从央视离职，7月13日以顾问形式加盟傅盛战队。

然而，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卢志扬博士就教育在其中的“失位”做了分析。他认为目前中国创业创新面临的瓶颈是人才，教育的创新是所有创业、创新的前提。中国传统教育的包袱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虽然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开始重视创业创新课程，但依旧沿袭原来的老方法。他认为，在创新创业的趋势下，教育必须先行，过去上行下效，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跟着做什么，这样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同样，在教育领域，学术创新作为创新创业的温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应该借此机会彻底审视自身的教育模式，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型教育体系。学校不能继续做着闭门象牙塔，而应当成为创新创业的温床，让学生有能力从生活而非课本中找到创新的源头。如果中国今天要在世界的创新平台上拥有一席之地，我们唯一能够举着的旗帜就是我们文化的旗帜。

当记者问卢博士，中外在创新平台及学术环境上有什么差异时，卢博士的回答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外在创新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创新在国外大多是个人理想的结果，而国内则更多是政策提倡的结果。二者也许存在差异但并没有好坏之分。中国创新所需要的条件与国外是不同的，我们不能一味把国外创新的经验引入国内，变成教科书式的东西去讲

授，应当注重我们创新思维的培养，而教育则是创新思维的温床。创业不应当是一种赌博行为，成了就成了，不成就认倒霉，好的创业态度应该是无论输赢，仍然坚持不懈，不断创新。

3. 大学生创业： 学业与事业的权衡取舍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处在求学于象牙塔与求职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关于大学生创业，有人赞，有人毁。有人认为大学生冲劲足创业成本低，有人则认为不应将大好的学习时光置于创业失败的高风险下。关于这个问题，嘉宾们也给出了各自的看法。

何时应该开始创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卢志扬博士和陈向东先生有着相似的看法。卢博士认为，就大学生而言，在继续学习与步入社会进行创业的权衡取舍中，应该少一点

卢志扬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国际生产工程学院院士，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 IMPACT 研究实验室创始主任，国际生产工程研究会设计分组前任主席，是产品设计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协同工程和激励技术。先后发表（出版）二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提出了产品合作设计中的“多利益方协调理论”。现任南加州大学航空宇航和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工业和系统工程教授，南加州大学产品开发工程项目主任。

强求，多一些顺其自然。创业只是好的创业想法的自然延伸，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我们的终极目的。陈向东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追随自己的内心，倾听内心的声音，来决定是否应该做一件真正要冒风险去尝试的事情。

比尔盖茨辍学而创微软，乔布斯退学因而巨大的苹果帝国诞生，这些成功的案例常常容易让人们给辍学创业蒙上一层并不那么真切的美好光晕。卢志扬博士认为，辍学创业是非常不合适的。创业是过程，是结果，而非刻意的目的。人才的培养需要程序，而这个程序是不能被压缩的。创业不是赌博，不应鼓动年轻人去做一些碰运气的事情。大学期间学生们应当通过喜欢的专业选择今后的职业，而没有职业的人是很难创业的。创业创新不应成为一种运动，这会使整个社会包括学校变得特别浮躁。创业创新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

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学习。只有当一个人最终形成创业态度之后，才会不断地创业并把创业变成事业。浮躁的创新创业只会变成我们整个社会的灾难。

张泉灵女士与卢博士的意见颇为相似，从创业门槛的角度来看，虽说当下创业环境、资本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来自父母的压力与要求都会相对较小，创业机会多，她还是不太赞成学生阶段创业。创业并非也不应当成为一种时髦。现在很多年轻创业者走入了在无意义的地方过分纠缠的误区，却没有在“差异化”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张泉灵女士以自己曾遇到过的创业者为例向我们说明了“差异化”的重要性：她曾经遇到过一名有志于建立一个基于加油机的支付系统的创业者。他认为他的系统相比而言优势在于，顾客在车上就能完成支付，这省去了人们开门下车的时间。然而，表面的差异背后其实并不真正存在差异。在双寡头竞争下改进的用户体验几乎为零。此外，她还认为，创业需要创业者充分了解用户特性。创业者必须理解社会，理解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制造出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产品之所以好，在表面的用户体验背后，是强大的数据支持和无数失败者的经验教训，这些只有真正做过产品的人才能理解。比如某款移动端的 APP，打开方式是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划，还





是一个按键直接点进去？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未曾经历过产品制作的人不能理解的。因此，对创业者而言，在创业初期不妨先从普通的打工仔开始，打拼几年，充分了解产品与行业，等到天时地利人和，与一种“时不我待”我再不做别人就会做的想法出现时，再开始自己的事业，这时依然是来得及的。

也许更加中性的回答是陈向东先生的说法：不管是顺利通过大学研究生博士阶段还是本科辍学创业，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究竟什么时候进行创业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是否已经你要问你自己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决定，这个不是任何哪一个专家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告诉自己要不要开始创业？等你准备好了，那就出发。

罗朱莉（Juliet Luo）博士对休学创业与休学实习持截然不同态度，她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对休学实习这一在欧美国家常见的现象具备更多的包容度。她认为，此举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让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有很多富裕的家庭其实更看重孩子的社会能力。

孩子们说“我需要自由”，不同的自由度，对塑造孩子的人格方面会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同时，她对于休学创业可能带来的问题也有很清晰的认识：“此举需要看个人，有些人是不适合创业的，你觉得你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政府号召我们做我们就去做，美国政府也号召创业，但他不是一个运动，你要想创业，政府支持你，你不想创业他会鼓励你去走另一条道路，盲目的创业是很危险的。”

4.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积极互动，参与竞争

很多创业者将社会资源的调动及利用看的十分重要，就此，我们特别采访了陈向东先生及张泉灵女士的看法。陈向东先生认为，过分寻求社会资源其实已经形成了误区，单靠所谓的社会资源是做不成一个优秀的公司的，世界上伟大的公司都是靠市场竞争出来的。的确，在创业初期，社会资源很重要，但是竞争的核心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本身能不能帮到别人”，在他看来，真能把产品做到极致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所谓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

张泉灵在谈到社会资源的问题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今天来参加创新之夜，就有几个很大的收获，首先是因为跟学生会熟，跟老师熟，所以北大会邀请张泉灵来做主持，我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项目。”虽然作为投资人张泉灵女士是一个新人，但是由于互联网核心领域的竞争被巨头企业抢光了，大量的都与传统相结合，那就意味着领域会非常非常多，就更意味着每一个投资人都要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她风趣地对记者说：“如果任何领域的专家我24小时之内找不到，那我18年的记者就白干了。”

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阵“下海潮”，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国企员工各社会群体中都有人下海经商，诞生了一大批诸如联想、万科、万通这样的业界巨头，相应地成就了柳传志、王石、冯仑这样的企业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后悔自己没有赶上这一波“致富潮”。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又有一批年轻人投入到互联网创业大潮中去，这些年轻人中就包括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不仅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头羊，也成为中国企业闯荡世界的名片。面对第三波创业潮，身为年轻人的我们，会不会摩拳擦掌，会不会踌躇犹豫，又应该何去何从？

创业的决定从来都不应该由别人替你作出，同样，任何来自外界的建议都应当只是参考。光鲜的成功者脚下是无数失败者铺就的血路，新奇的产品背后是许多个日夜的艰辛付出。如果准备好迎接创业的荣光与泪水，就出发。🏠

方文山的文化讲堂： 我喜欢有中华底蕴的东西

文 / 周思妤

《东风破》、《烟花易冷》、《青花瓷》、《天涯过客》……在这些中国风的创作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文字魅力与情怀？11月13日下午，台湾知名作词人方文山先生来到北京大学开讲，主题是“浅谈汉字在世界文明中的意义”，向我们娓娓道来，他所热爱的中华文化。





热衷于“汉字”

方文山创作 400 多首流行音乐当中，就有 70 多首属于中国风，方文山说他喜欢有中华底蕴的东西：“我喜欢这样的文化氛围，音乐创作是我的工作，对汉字和书法的偏好是我的兴趣。”他把这样的偏好化作创作的根源，甚至是养分，与他的歌词结合，成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

“汉字的意涵跟拼音的意涵是完全不一样的，汉字是任何地区、任何文化、任何种族、任何国家，几乎借了就得完全借走的字体，也就是字形、字义、结构都要原封不动借走，你不能去更改它。”讲座中，方文山亮出自制的文字地理分布图，谈到汉字的发展渊源，并与其他文字做比较，向我们证明汉字的独到之处。他指出世界各国大概唯有汉字是“超时空、超地域、超方言”的文字系统，也唯有

汉字，具备特有的艺术表现——书法。

“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你脚步碎

“忙不迭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

《兰亭序》歌词的灵感来源，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方文山以行书的行云流水描写女子的美貌和姿态，歌词古意翻新，

展现丰厚的文化底蕴。别具韵味的歌词，来自方文山对汉字之美的感悟，在讲座中他强调：“书法是汉文化里头最特殊的艺术形式，世界上的文字只有汉字的书法可以被视同绘画，去欣赏它的美感。”为了让现场的我们好好欣赏书法美，方文山播放由他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天涯过客》“书法版”MV，书法家

陈旭冈将歌词以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四种字体来书写，增添了这首歌的古风之美。虽然方文山从来没有上过一天书法课，但直到现在他仍会抽空挥毫练字，也会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讲座尾声他献上亲手写的墨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位中国风词人的背后，有着对汉字满腔的热血与执着。

“我喜欢这样的文化氛围，音乐创作是我的工作，对汉字和书法的偏好是我的兴趣。”

据悉，方文山将筹拍书法戏剧，把这样的美学、结构、知识变成一个通俗的戏剧，用通俗流行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事实上，方文山的

影视剧作品延续了他在作词方面的风格意境，2013年，他执导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将自己钟爱的书法、水墨画等传统元素融入电影，更特地邀请书法大师董阳孜为电影片名题字，打造独树一帜的“方道”电影。

他表示复兴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字，而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中具有强烈影响力和识别度的文化符号，因此他呼吁学子多了解汉字文化，学习书法，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醉心于诗词

不单是作词人，方文山更是韵脚诗人，他善于用押韵创造歌词的音乐美，加强歌词的诗化气质，使他的作品亦诗亦词。方文山说道：“以前的古诗词，都有平仄、对仗跟韵脚，你很容易去背诵。韵脚会让文字有行进的节奏感，所以韵脚这个结构对古诗词很特别，因为它具有听觉的节奏感，会辅助你对视觉上歌词的记忆。”其实，他从求学阶段就喜欢阅读各种古典诗词，并传承了古典诗词的特点，无形中塑造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因此他的中国风歌词每首都力图

押韵。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青花瓷》的绝美歌词，令人一听难忘，素胚、仕女、釉色等词汇，描摹青花瓷的传世风采；方文山的古老灵魂，激荡现代流行曲风；韵脚的巧妙运用，让这首歌拥有诗化的韵律美。除了像写《青花瓷》这类很具象的歌词需要花较多功夫查找资料，方文山近期的创作类

型囊括戏剧、游戏配歌，他说道：“写戏剧、游戏这类的歌不需

要太找资料写，公司本身就会把剧情、主角性格给你，针对性比较强。除非这个主题是你自己去找的，才会去查资料。”

“将传统的诗词融合到现在的旋律里，是最好的结合。现在的流行音乐有时代的元素，但是当你结合了古代诗词的底蕴，会让整首歌的画面感、延伸性更强。”

对于中国风，方文山的看法是：“它是将传统的诗词融合到现在的旋律里，是最好的结合。现在的流行音乐有时代的元素，但是当你结合了古代诗词的底蕴，会让整首歌的画面感、延伸性更强。”他认为，把诗词的内涵与技巧带到歌词当中，可以提升华语流行音乐的质量，因此他很喜欢做这样的尝试，好的歌词可以把它当作新诗来欣赏，所以好的歌词某种程度上也应当算是一种诗。

倾慕于汉服

方文山创立的“中国风”音乐品牌蜚声海内外，而他在中华民族文化



领域涉足之广和深，宛如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今年10月底11月初在浙江西塘古镇举办的第三届汉服文化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

场文化盛事。“取得最具体的成果就是，汉服文化周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变成浙江西塘当地的一个文化名片。”

方文山身为活动发起人，每一次他都身着汉服亲自参与。回首三年以来的心得：“第一年最辛苦了，我们还要去发动人来参与，因为那时候没什么知名度，又在浙江西塘这样一个小镇。到了第三年就是自发性了，虽然对外还是要宣传，但是汉服圈内不太需要宣传，有些人就会记得，每年到这期间会有这样的活动。”

如同他的歌词创作，汉服文化周的设计注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除了往年有的朝代嘉年华、汉服PARTY、箭阵操演等多个环节以外，今年增加了汉服集体婚礼、国学四艺、西塘写生等全新环节，展现汉服生活化、多元化的一面。一路走来，方文山期许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创新贡献一己之力：“取得最具体的成果就是，汉服文化周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变成浙江西塘当地的一个文化名片，作为一个每年都有的常态性活动，慢慢地西塘跟汉服就连结在一起了。”言谈中，方文山充满肯定与自豪的意味，更有一股使命感，他觉得已经达到了发起活动的初衷：“初衷就是复兴及推广汉

服文化，藉由活动这样一个形式，让不管是汉服社团还是外界了解。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参加，西塘本身也比较小，

但是现在网络平台非常强大，你在黑龙江、在云南、在新疆都能看到这个活动，

效果一届比一届好，汉服文化周还会一年年继续办下去。”

“我魂依旧汉服青史留千年后系带宽袖成传说

“我魂依旧汉服千古愁着交领右衽在等候”

这首《汉服青史》便是以汉服为灵感。方文山想透过这首歌展示中华传统服饰之美，并展现中庸、正直、诚信等中华礼教精髓。“我没有拿某一款服饰来细写，因为常服、礼服、长裾、短裾这样汉服的款式太多了，所以整首歌都讲整体的汉服。但是不排除未来选一个我比较偏爱或能见度比较高的汉服款式来写歌。”方文山最偏爱宋代的朱子深衣，他认为这种服装穿起来很仙风道骨。而如今，汉服不为社会大众所熟知，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汉服，基本上只会蹦出“这人是拍戏的”或“这人正在拍古装写真”这两个想法，忘却了它是文化积淀的文明符号。方文山希望扩大汉服礼仪的能见度：“大陆人口基数多，社团比较多，活动比较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甚至

方文山

1969年1月26日出生于台湾花莲县，资深作词人，为周杰伦御用金牌作词人。也曾为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蔡依林、林俊杰、S.H.E、吴宗宪、温岚等艺人作词。其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新的意义，创作的歌词中富有画面感和东方风，开创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2003年和2008年分别凭借《威廉古堡》和《青花瓷》获得第十二届及第十九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2013年执导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同年发起“汉服文化周”活动，致力参与各种中华文化交流活动。

有很多实体的汉服买卖。但是台湾相对来讲推广汉服比较寂寞，人口基数小，汉服社也不太多，可能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多关注。但是我们可以互相支持，我们藉由这个汉服文化周活动，把大家串在一起。”

在瞬息万变、生活节奏快速的当代，方文山想以通俗文化的语言推广传统文化。不论是音乐还是影视剧创作，他认为这是最没门坎、最贴近一般人生活、也是能获得最大影响力的方法。我们发现到，方文山绝非一个歌词制造机，而是一位狂热的中华文化推广者，仿佛扮演传统与现代间桥梁的角色，把年轻人眼中高大上却难以亲近的书法、古诗词、汉服等文化元素，用他的创作使新旧融合并接上地气，期盼唤起更多人的重视与回响。合





建设与与众不同的综合性大学

——专访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文 / 冯子涵



2015年11月26日上午，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访问北京大学，并举办了悉尼大学日的活动。在悉尼大学日的宣讲结束后，我们荣幸对迈克尔·斯宾塞先生进行了专访。他就综合性大学的建设和大学国际化中所需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鲜明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澳大利亚顶尖高校在走向国际舞台的过程中，与众不同的目标和理想。

Q：您从2008年起开始担任悉尼大学校长。在这期间，悉尼大学的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担任悉尼大学校长期间，您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又是什么呢？

A：我认为，在此期间，我所面临的挑战和成就是相同的。我记得，在2000年时，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致力于进行专家的培养，并不断的将知识分科化，零碎化。我们倾向于把

学生分散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中来进行学习，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当我来到悉尼大学时，悉尼大学的学生也都有各自的范围极小的研究领域。我们有六十多个学科，分类非常精细，研究领域也相对狭窄。但是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肥胖等全球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学科分支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大学中各个专业的知识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对策。所以，我们尝试着将大学中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者结合起来，去思考解决社会所面临的这些综合问题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校长的我所做的，便是努力确保“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从而一同克服这些社会问题。

我认为，悉尼大学的查尔斯·铂金斯（Charles Perkins）中心，便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很好例证。这个研究中心致力于对肥胖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这个中心吸收了研究我们的购物和消费结构的经济学家，研究我们如何认知事物的心理学家，还招揽了环境学家，农学家等各方面的专家。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如此——我们将通过努力确保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一同工作，共同思考和解决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Q：在您的领导下，悉尼大学打造了与众不同的发展战略，包括“2011-2015年悉尼大学战略计划”。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也是在这一时间段建立起来的。您为什么认为中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研究中心建立起来后又取得了哪些研究成就呢？

A：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飞速发展的经



济，大量的人口以及在全球范围上的政治地位，都赋予了中国重要的研究意义。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对于澳大利亚今后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因此，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大量学生在研究现代中国。世界上的所有大学都有工程、法律、药学、健康科学、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我们建立中国研究中心的目的，即是通过这一中心，来保证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结合起来，共同思考中国的相关问题。例如，如果想要研究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不仅需要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出谋划策，也需要环境科学研究专家，律师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共同努力。在解决这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数学家来建立人口流动的模型，也需要地质学家来研究地理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我们希望可以帮助让这些专家可以在一起工作，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进行共同研究。

Q：那么，您为什么认为悉尼大学需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呢？

A：我认为这其中的重点是我们学习以怎样的方式去获取知识。过去，我们把世界一步步划分成非常小的部分，从而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解。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合起来，通过更广的视角来研究世界。悉尼大学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拼合的角色。

Q：据我们了解，今年，悉尼大学2016-2020年的发展战略规划也在制定之中。在这一新的计划中，您想作出怎样的改革？您希望通过新的发展战略规划达成怎样的目标呢？

A：在新的计划中，我们将对悉尼大学的大学生教育进行完全的改革。现在我们有一百七十多个院系，每个院系的研究领域都非常狭窄。我们正在通过课程改革，确保学生不仅拥有足够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能学



到更多的通识知识——一些关于文化、物理、历史、自然科学等不同方面的基础知识。例如，如果一个学生想要获得一个法语专业的学位，他就需要知道关于法国的方方面面的知识。但是我认为在美国，大学毕业生基本不了解除了他们所学的专业之外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知识。对于他们而言，如果想要得到一个法语专业的学位，他们只需要知道一点关于法语，法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本科教育系统用以确保学生不仅能够专业深度上发展自己，也能在广度上得到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也正在通过院系间的联合来改革我们大学的院系设置结构。我们将会改革我们的学科设置，把研究领域相近相关的人群联合起来。

另外，我们也会增加我们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的投资，这是极为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在国际技术引进上的投入，这对悉尼大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Q：一个大学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必然将会面临许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不久前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这是一个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而引发的悲剧。作为一位大学校长，您是否会因为大学校园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和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而感到紧张？您认为大学在面对这样的冲突时应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A：我认为大学应该提供给学生应对这样的问题工具。美国的高校

就曾经经历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对于一同求学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幸运的是，在澳大利亚，总的来说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够很好地进行交流。我认为，大学在这样的冲突中需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调解角色。在悉尼大学，有许多针对本科生的必修的文化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学生们能够了解什么是文化冲突，也能够拥有一颗愿意倾听和理解一个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的心，从而防止这类悲剧的发生。

Q：您能告诉我们更多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的细节和具体措施吗？

A：我认为这样的冲突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对他国文化的无知，

以及没有理解其他文化的工具。所以当这些人遇到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坏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教育学生，使他们具有多角度认识问题的能力，也要给予他们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工具，使他们认识到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对世界有所贡献。

Q：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与您的个人经历相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在牛津大学有过二十余年的求学和执教经历。在这期间，您在专业知识和管理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您认为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有什么区别呢？您在牛津大学执教的经历有没有影响到您在悉尼大学实施的政策呢？

A：我认为牛津大学和悉尼大学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牛津大学的规模较小也只专注于某几个学科的研究，但悉尼大学非常大。我们有一万余工作人员和五万三千余名学生、我们教授几乎所有的学科而且我们也拥有之前所提到的任何一个综合大学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牛津大学的教育是完全专业化的。这种教育方式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当你在思考一些大的问题时，如果不通过他人的帮助，你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举例来说，当你在思考医疗体系的改革时，护理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牛津大学并没有护理专业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悉尼大学则是综合性的大学。我们有许多致力于不同领域的研究的学科，因此我们可以用更全面的方法来研究更为复杂化的问题。而牛津和悉尼大学的相同之处则是在于牛津大学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我们也有着这样强大且可靠的传统，也一直在培养

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Q：所以牛津大学和美国的高校是悉尼大学学习的典范吗？或者您想做一些与之不同的改革呢？

A：我想做一些不同的变革。对于全世界的高校来说，一同联合起来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大学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留其地方性，适应当地的需要。例如，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校，既需要成为国际化的高校，也需要努力成为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悉尼大

学也是如此。

Q：您是否认为不同地区高校间的合作能够对两个国家和世界作出贡献呢？

A：我认为两所不同地区的高校合作可以给世界教育提供更多不同的发展可能性。长期以来，大学的发展趋势一直受到美国和欧洲文化的主导。我国的高校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和经验交流可以改变国际大学的普遍状况。我们可以为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合



我爱的中国， 她莫名其妙

——英国留学生王大雄的中国故事

记者 / 于佳鑫 同子怡



“你们一定看到了夏天的时尚，明白它的原因是我唯一愿望。人人头上，别着花花草草。”2015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留学生王大雄突然将帽子掀开，露出头顶上的“豆芽花”发夹，引得现场观众捧腹大笑。他摊了摊手，接着说：“一时的火爆——莫名其妙。”

这是北京大学2015年留学生汉语演讲大赛的第二场，来自英国的王大雄以地道诙谐的语言表达和丰富生动的肢体表演赢得了冠军头衔。他征服全场的演讲题目，源于他创作的同名中文诗——《中国的莫名其妙》。

“我之前不知道不可以用诗作演讲稿，比赛结束之后老师才告诉我这样是不可以的。”王大雄不好意思地

笑了笑。

爱所以选择

高中时期，较有语言天赋的王大雄就开始了法文学习。2011年，王大雄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在继续法文研究的同时，他决定尝试学习汉语。“起初选择中文是因为知道现在中国发展迅速，学好汉语对来中国找工作有好处。”王大雄说。

2013年，王大雄作为交换生来到清华大学。第一次踏上中国，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觉陌生又新奇，甚至有点“莫名其妙”。第一次使用蹲便器，第一次见识臭豆腐，甚至看到街上相

比英国体型较小的宠物，王大雄都能突发灵感：“中国的宠物好像比较小，毛茸茸的小狗，可爱的猫。听一声的“汪汪”，再听一声“喵喵”，我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

在清华短暂的一个学期里，王大雄记忆最深的是他的中文老师，“那时我的口语特别不好，她会课后一字一句地辅导我，还会组织班上同学一起出游。”在老师的帮助下，王大雄的汉语有了显著提高，在中国旅行也没了语言障碍。

在北京丰富愉快的学习生活让返回英国的王大雄念念不忘，“每天都盼望着有机会继续在中国学习，在这里住、在这里吃。”本科毕业后，王



王大雄

大雄向英国政府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并顺利通过了HSK3级考试再次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我在中国有最好的朋友，有自己的乐队，还有关心我的老师，我想象不到还有哪里会比中国更让我舒服。”王大雄兴奋地边比划边说着，似乎又回到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幸好，我最后得到了这个奖学金。我爱这里的一切。”

经过四年的中文学习和在中国的

经历体验，王大雄对中文的态度大为转变。“我喜欢这门高难度语言的挑战性，它就好像是一道谜题，我享受这个学习过程。”再次回到中国，选择在北京大学深造，王大雄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真正了解中国。“用英语了解中国和用中文了解中国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只有当我学习了成语，才会知道短短四个字可以有那么丰富的含义，这是我未曾学习中文时不可能体会到的。”

“当我足够了解这里的文化和历史，我才会更爱它。”王大雄说。

行走中体悟， 中国的莫名其妙

出生于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使王大雄对于感受多元文化从来乐此不疲。到每一个新地方，他都会努力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大一进入伯明翰大学，让王大雄结识了来自英国不同城市的朋友，初次体验了多文化的生活圈；大三时期，在魁北克学习的他有了接触法国人、加拿大人，感受那里人文环境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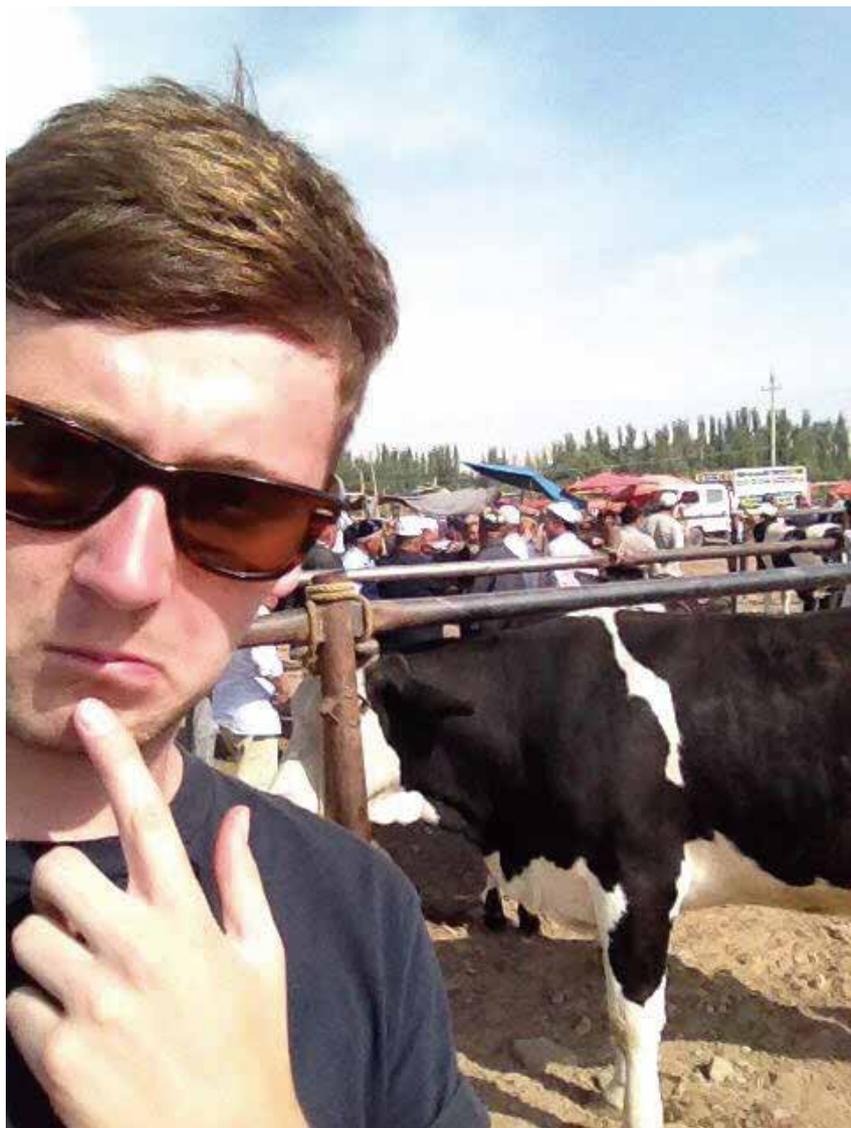
“但在中国学习带给我的文化交流是最多的。”王大雄说。

带着对多元文化的渴望和探索中国的好奇心，王大雄开始在行走中体悟真实可感的中国：“我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西北、南方、东北都去过，遇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挠了挠头。

在王大雄眼里，喀什之旅是最莫名其妙的。维吾尔族的独特文化风情让自以为较为了解中国的他大开眼界，甚至觉得“仿佛离开了中国”。

谈到喀什的牲畜市场，王大雄连连惊呼不可思议。“那里到处是牛、羊、马，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动物世界！”看到维吾尔族的父母带着自己七八岁的儿子在大街上杀羊，他大为震惊：“那里的小孩子 and 英国、甚至北京的小孩子都不一样，他们更勇敢！”

“旅行让我更了解中国，了解她的不同地区。也正是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让她更具吸引力。”如同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对于中国，王大雄觉得莫名其妙之余充满惊喜。



王大雄在喀什

“我不能也不喜欢去设想如果四年前我没开始学中文，之后没来中国的话，我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能够感受其他文化的机会是无价的。”

TAKE IT SLOW

走上演讲舞台的那一刻，王大雄紧张得不敢看观众，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麦克风上，只希望“不要摔倒”。随着观众的笑声与掌声，他才渐渐放松下来，自然地抖出一个又一个“包袱”。

为了这场比赛，王大雄数次和老师逐字逐句地修改演讲稿的语法和韵脚。他还在同学面前不断模拟演讲，向中国同学请教正确发音，力求完美的他十分珍视这次比赛机会。

对于自己最终的表现，王大雄很满意。“比赛前我就对自己能够完成一首中文诗的创作感到自豪，我的朋友们都告诉我说这首诗很有趣，但我并不敢想象自己能够完成演讲并获得最受学生欢迎奖。尤其是在其他同学也讲得这么好的情况下。”

今年的留学生新年晚会，王大雄希望可以担任主持人，他认为自己现在的汉语水平足以向大家展示。“当然，我还想好好写几首歌曲，说不定明年会参加留学生十佳歌手大赛。”他笑起来。

但对王大雄来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加紧学习汉语，争取明年通过汉语水平五级考试。为了这个规划，他推掉了很多的社团和活动邀请，在校时间大都用来上课和复习。空闲时他会和好友在中国各地旅行，熟悉中国文化，练习汉语的使用。

待在中国一年多了，真正谈及未来时，王大雄露出了一丝迷茫。因为



王大雄赢得演讲比赛冠军

已经“爱上了这个带给他太多莫名其妙的国家”，他希望在完成汉语学习后，留在中国工作。

至于具体方向，他觉得自己也许会去给很投缘、很有趣的同龄人做英文辅导，也许会从最基本的超市工作人员做起，也许会离开北京，躲开“莫名其妙”的雾霾，“说不定我会去杭州或者成都呢，听朋友说那里很美。”而他更希望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出对中国文化的

误区，踏上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看到中国的丰富多彩、看到中国的巨大进步、哪怕是看到中国的“莫名其妙”。

“我还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不过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我才23岁，还很年轻。”王大雄笑了笑，问：“How do you say ‘take it slow’ in Chinese?”

“慢慢来。”

“对，我就是想慢慢来。”合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附:

《来自中国的莫名其妙》

王大雄

我的老家很安静，位于英国南方一个小小的城市，我在那里生长。来中国以前，我当然不熟悉它陌生的情况，它特殊的风气。

我去年二月第一次来北京，带着我糟糕的汉语水平。我在中国的经验当时比较少，结果看到了太多莫名其妙。

现在经验更多，我是个中国专家，可是，有的时候，还会说“哎呀！中国常常太奇怪，我就不得不得笑，但我有时会觉得莫名其妙。

比如说

我记得第一次用蹲便器，详细的描写——不必提。它让我的双腿疼得受不了，用它的姿势——莫名其妙。



你们一定看到了夏天的时尚，明白它的原因是我唯一愿望人人头上，别着花花绿绿，一时的火爆——莫名其妙。



臭豆腐的味道实在太浓，我们两国的饮食当然不同。30个饺子，15个包子，3碗米饭，我都吃得下，但至于臭豆腐，却让我莫名其妙。

中文，啊，中文，我说得越来越如我渐渐掌握了它四个声调，但我还遇到困难，无论是在哪儿，比如北京的儿化——莫名其妙。

中国的宠物好像比较小，毛茸茸的小狗，可爱的猫。听一声的“汪汪”，再听一声“喵喵”，我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

西方的小孩儿习惯带纸尿裤，但中国小朋友都穿开裆裤。看到小孩儿蹲地上尿尿，绝对会让我莫名其妙。

北京夏天的热，在英国简直这吓死，北京小伙儿，他该怎么办？解放你的肚皮！让大家瞧瞧！这样的装束，怎么样啊？嗯，莫名其妙。

你也许会问我：“不喜欢中国吗？”我应该说，是我最爱的国家！在中国，天天与我惊讶，它从不单调，我在这里的经历，让我忘不了。

恐怕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批评，其实我觉得这里的生活还行。我又想得罪你，我只是想强调老外，他会觉得，莫名其妙。



2006年柯修在北大

从“汉语桥”到“一带一路”

——柯修的北大情结

文 / 余物非

来自孟加拉国的柯修 (Kishore Biswas), 是北京大学的校友, 也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一带一路”外语项目孟加拉语教师。1999年, 他走近中国; 2004年, 他与北大结缘; 2015年, 他开始在北大工作。从当初面色稚嫩、羞于交流的孟加拉小伙到如今仪表堂堂、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北大教师, 对于曾经难以表达的汉语、曾经颇有距离感的中国和这座改变他一生的园子, 柯修有很多的话想说。

初识中国, 走近汉语

深邃而充满善意的眼神, 端庄而不失休闲的衣着, 始终带着微笑的面庞, 柯修身上的一切都让我觉得那么亲切, 那么值得去挖掘。在我还没来得及说“hello, my name...”时, 刚走进房间的柯修就用一口流利的中文问候了我。

柯修对与中国的“初次见面”记忆犹新, 这还得益于当时中国出口商

品援助孟加拉国。在他上小学时, 新学年开始会发新书, 而同时下发的还有书皮, 用以保护脆弱的课本。这些书皮多为从中国进口质量优良的厚纸, 有的上面印有中国的城市、农村、工厂、花园等图案, 图中的烟囱、果树和鲜花让柯修初次接触到这个神奇的国度。而他小时候用的比较耐用的铅笔、橡皮、尺子,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上面都写着“中国制造”四个字。虽然当时小柯修不会中文, 但端庄的方



2009年第二届“海尔杯”汉语桥比赛中的柯修

块字还是激发了他对中国和汉语的兴趣，那时他常把“中国制造”当艺术绘画来模仿。柯修通过中国出口到孟加拉国的商品了解到中国，脑海中也形成了对这个神秘国度的憧憬与向往。此外，柯修还提到了中国功夫。他说，中国功夫在孟加拉很受欢迎，尤其是中国功夫的电影，成龙、李小龙都是孟加拉人喜欢的明星。他当时并不知晓夸张的成分，看到中国功夫能让人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功能，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便觉异常神奇。这些构成了促进柯修走近中国的最初动因。

1999年，高中毕业的柯修得知中国政府会为孟加拉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尽管依旧不了解中国，且整个国家仅可有5人获得资助，但是抱有最初的兴趣与好奇，他报了名，并认真准备考试。就算在考试中遇到直逼高考难度的试题，他从未选择放弃和提前交卷。经过六七百人参与的海选和残酷的笔试、面试，坚持到底的柯修以第一名的成绩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助，让他最终有机会亲近中国，接触

汉语。

来到中国的第一年，柯修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中文，上了两学期汉语课，而后他边了解所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边学习汉语。最初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他曾在武汉的光盘售卖点寻觅心仪的软件，虽然尽力把中文说得准确，但因为音调有错误对方一直无法理解，他最终说了十几分钟，口干舌燥，也没能买到心仪的软件。多次的尴尬与失望后，柯修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立志学好汉语，说：“我希望我说的话能让所有人听懂，所有人说的话我也都能听懂。希望真正实现交流方面无障碍”。

以此为目标，他开始以兴趣为导向走近汉语。他说：“我喜欢看电影，用喜欢的事情来学习语言真的很快乐”。每每提到电影，一共看了几十部中国电影的柯修总是滔滔不绝。而由于最初的兴趣，他所涉猎的影片以功夫主题为主。柯修看电影一定要把所有的台词听懂，将不会的词语记下来，不是查词典就是问同学。随着他

“吃透”了一部又一部中国电影，他渐渐明白了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学到了一些实用的词语和内涵丰富的句子。比如，在看张柏芝出演的一部电影时，他开始将“随便”一词用于生活；在《李小龙电影全集》中，李小龙的“我不说我是第一，但我也不是第二”让他感受到自信与谦虚合璧的奥秘。

来到北大时，柯修的汉语已运用得相当娴熟，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以活动和交流为基点继续磨练。2009年，他报名了第二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并以此为契机继续钻研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代表北大参赛的柯修读书充实自己，并学习了此前涉猎不多的成语、歇后语，深究了每个词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他积极接触中国同学，虽然住在中关新园，但他大部分时间跟中国学生一起吃饭、一起交流、一起玩乐。“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学生的宿舍度过的”，他说。加之此前的积淀，跟中国学生密切的交流，柯修斩获第二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金奖。而在节目中，他了解到有外国人学习中国的书法、京剧等独特艺术。随后，柯修也开始接触中国传统艺术并在深入学习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赞赏有加，很是喜欢。

此外，他还参与了与北外进行的校际的“3+1”辩论赛，并依稀记得当时的辩题是“留学利大于弊/弊大于利”。他认为，“辩论是很好的锻炼语言的机会，不仅是会说，而且要有逻辑地反驳。它要求话要说得又快、又有效、又有逻辑，而且还得抓住别人的问题”。他还说，当时每周四五下午是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练习和准备材料的过程

中，他从队友身上学到了不少语言技巧，快速提升了口语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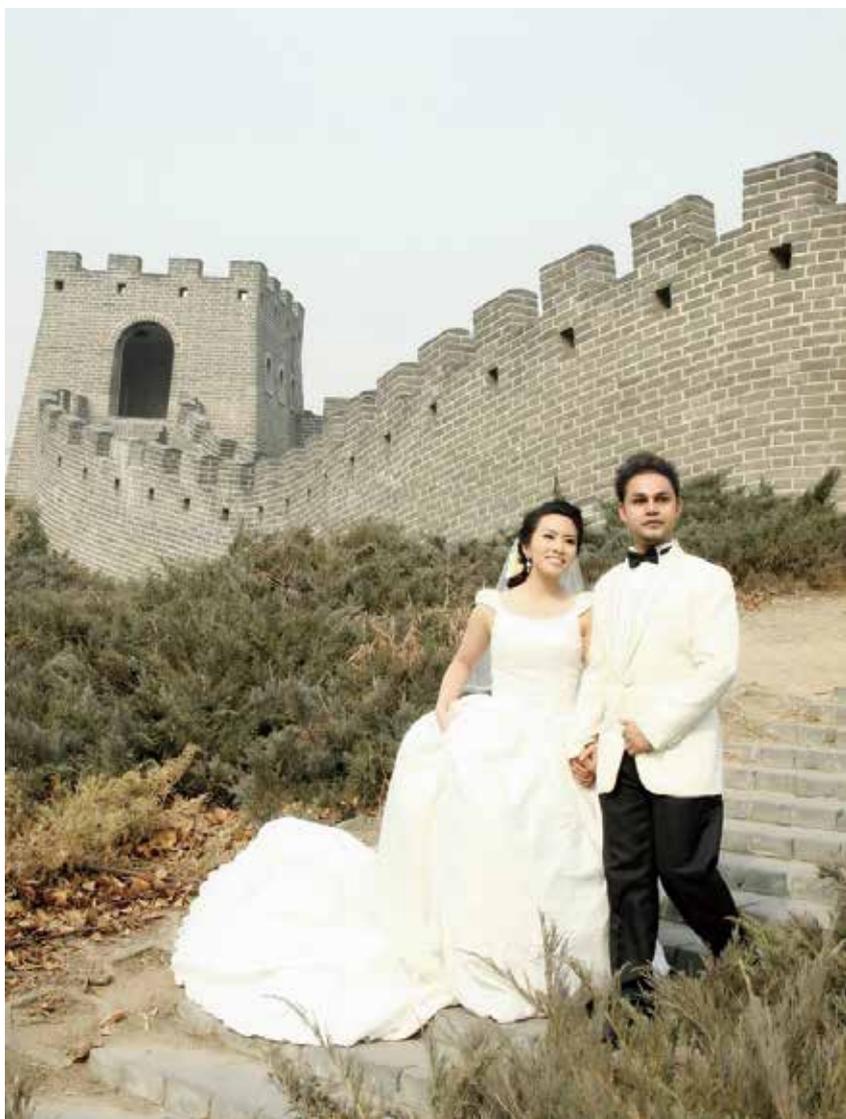
多年在中国，柯修在不断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风土人情，游历了北京、湖北、福建、山西等 14 个省市，爱上了这里的一切。

学在燕园， 师友相伴

柯修在北大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业。2005 至 2008 年，他在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方向学习；2008 至 2014 年，他在信息管理系情报学专业自然语言处理方向继续深造，研

究多语言文档自动文本摘取。值得一提的是，他读博时在信息管理学核心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和《图书馆学研究》上共发表两篇论文，学术方面颇有建树。一路走来，柯修十分感谢相伴的老师与朋友。

硕士期间，他的导师孙斌老师和他同一实验室的刘培同学对他帮助很大。当时的香山封闭式开发环节让柯修非常难忘。研究的项目是开发北大计算语言所自己的一套信息提取软



2011 年柯修的结婚照

件系统，主要用于 web 中中文、英文、孟加拉文的网页内容。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导师和同学们在香山的一家宾馆住了一个多月，期间没有人回家。当时，他每天与孙老师和刘培一起编程序。刘培多次与他讨论如何把程序编得更好些，并耐心回答柯修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帮助他一点点提高。“研究之外，老师还会安排出去爬山、一起聚餐，”柯修说，“那时真的学了不少东西，每天过得充实而快乐。”

博士期间，在王惠临导师的指导下，柯修发表了两篇含金量极高的论文。博士的毕业论文有 10 万字，这对于中国学生本就不易，对于留学生更是难上加难。最早的开题环节，柯修有什么想法都会与导师讨论，根据老师的建议柯修的题目不停地修改。他记得最初定的题目还有“自动文本摘要中引入语义分析”等等，但最后经与导师缜密分析后确定“多语言多文档自动摘要的研究”为论文题目。每次讨论，老师总是耐心、包容。而对于行文，刘丹同学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因为刘丹之前在某情报学论文出版社做兼职，对论

文的编辑与发表比较在行，柯修有什么汉语写作上的问题都会咨询她。一句话要斟酌够不够专业和书面化，遇到比较长的句子需要检查通顺与否，不通顺改怎么梳理一下……这些问题柯修经常咨询刘丹，这也极大提高了他的汉语写作能力。

而柯修在学业上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非他的爱人莫属。2006 年的那个夏天，正在读研二的柯修在图书馆借书，正好有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女生也

在借书，二人就因为一次偶然的借书经历相识，并在之后多次相约一起吃饭聊天，一起自习，由此开始了一段幸福的姻缘。感情上的支持之外，他的爱人还帮助柯修提高汉语写作水平，并且帮在博士论文写作上给予帮助。

“当时有些长句子怕产生歧义或不通顺，我总会让她先读一遍”，柯修说。

2011年6月16日，二人步入婚姻殿堂；而今，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岁。一次奇特的相遇将素不相识的二人变为比翼齐飞的伉俪，经历之神奇，足见北大图书馆对于柯修的意义。

师友相伴的柯修，在燕园提高了学术造诣，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朋友交际圈，更收获了家庭，成为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对园子的情感与爱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令他难以割舍。

多元北大，心灵之家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负责老师、

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的魏丽明老师和她的朋友博士生杨伟明的盛情邀请，加之自愿为硕士导师孙斌老师做汉孟英电子辞典开发，继续研究计算机软件，柯修自然而然留在了燕园，开启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作为一个在燕园学习生活了十载的青年，柯修眼中的北大自有别样风采。

柯修认为北大有两大特色吸引他留下来：一为美丽的校园带给他的归属感，二为丰富多彩的活动。柯修说，他很喜欢北大的校园风格，有的楼古色古香很有历史底蕴，有的楼新兴拔地而起颇具现代气息，博雅塔、未名湖一直具有的独特气质，北园草木植被的郁郁葱葱……都深深吸引着曾经初到燕园的孟加拉小伙和如今已工作成家的有为青年。而且对于来自异国他乡的柯修，北大的一草一木蕴含了太多的回忆。走在校园中，柯修总能想起当时的情景与当年的师友。“这里的环境让我有家的感觉，很温馨。”

柯修说，北大多元的活动是使他留在燕园的第二个原因。从2005年至今，柯修参与的大小活动非常多，无论是校内活动还是校际交流抑或是代表北大参加比赛。参与的活动颇多帮助了他在北大发展了广阔的人脉。除了一次“汉语桥”和一次“3+1”辩论赛，柯修还对两个活动感触良多。

一是2005年至2011年他都未曾缺席的国际文化节，品尝各国美酒美食和风情文化之余，他不仅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中国同学，还结识了不少留学生朋友，许多人现在依旧保持着联系。二是北大留办组织的两次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一次前往甘肃和青海，另一次前往云南。两次旅程带柯修游历了青藏高原、敦煌、丽江、香格里拉等地的名胜古迹和秀美风光。在与当地人交流中，柯修感受到了中国不同地区民风的差异和颇具地方特色的多种文化，这些深深吸引了他。如此多精彩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他跟中国学生的交往，更带领他在北大探秘世界，在地方读懂中国。

在访谈的最后，柯修为向往中国的祖国青年献上了自己的寄语——“来中国一定会了解更多，来过肯定不会后悔，你们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国家的”。此外，对于滋养自己、成全自己的北大，柯修希望北大的校园能保持好绿化，保护好优美的风景，并祝愿北大的教育水平和学术实力继续上升，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更进一步。

从提升汉语，潜心学术，再到收获师友与家庭，留在燕园，十年来的一切，铸就了柯修深厚的燕园情，此处已成为这位孟加拉友人的心灵归宿。

合



2015年“一带一路”公共孟加拉语文化日活动中的柯修

蒋晖：

“我们到了需要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了”

文 / 刘东

“曾经的非洲和中国一样是礼仪之邦，这从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小说《瓦解》和《神箭》都能看到。真正爱非洲的人们一定会希望从媒体看到‘礼仪’和‘文明’的再现。”蒋晖在2014年8月《东方早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如是写道。阅读南非确实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脏。蒋晖的这篇学术随笔从中国视角出发，看到了南非现实暴力后面深藏着的礼仪与文明的可能。

为什么要在中国强调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坚持非洲文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这是蒋晖持续思考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到了需要研究非洲文学的时候了。



非洲、世界与中国： 研究非洲文学的三个需要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蒋晖对非洲文学、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转向已经有好几个年头。随着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也变得日益迫切。“我们现在有不少研究非洲政治、经济的专家，但非洲文学研究者非常稀缺。我不能想象，如果不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怎么能深刻认识那个地方的政治理念、社会伦理、经济行为，还有消费心理呢？”在这个意义上，非洲文学研究的意义得到了凸显，“文学是一个社会集体欲望和自我想象的投射，反映着那个社会的精神品质。文学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非洲人的情感结构和价值体系。”

“非洲文学研究因此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非洲风土人情的载体，是我们进入非洲的文化通道；第二，从今天看来，不了解非洲，对世界的了解也就不全面，欧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其庞大的殖民掠夺体系上的，研究非洲可以考察西方企图统治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模式。第三，研究非洲文学是中国文学自我理解的需要。”

非洲曾是西方殖民体系的一部分，非洲的文化深受殖民文化的影响。六十年代以后虽然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但欧洲的文化影响依然广泛地存在。因此，对非洲的理解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欧洲的理解。“但

这只是一方面，光看到这方面，不足以说明研究非洲对于认识欧洲的重要性。”在蒋晖看来，了解非洲对于了解西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非洲研究不能是小圈子里的事，非洲研究者必须与中国知识界对话，把非洲问题变成中国知识界的问题，这样，非洲研究才有意义也才有希望。

“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对非洲的发现才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欧洲对自己文明的说明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以第三世界为潜在的对话

者。欧洲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不文明’、‘不理性’中看到自己文明的独特价值的。不仅如此，非洲的文化元素直接刺激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毕加索的绘画，叶芝的狂



兽运动，康拉德、劳伦斯、吉普林等的小说……这些离开非洲的启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现代主义不只是欧洲内部的一个事件，理解它需要理解非洲的文化。”

正是因为这样，在蒋晖看来，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方文学运动都不能只作为欧洲的文学运动来理解：“在文学研究领域，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基石‘新批评’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文学研究理论，它首先是为了在第三世界

我们必须深入了解非洲的语言文化及其历史，否则我们存留的始终是一套非常平面化、符号化的虚伪想象。

进行文化殖民而制定的教授西方经典的策略。那时英、法都是帝国，欧洲文化的内部运动必须理解为帝国的运动，必须把第三世界作为这个运动的舞台之一。”非洲文学并不孤立于西方文学运动，非洲文学早已楔入西方文学的创造理路之中。

非洲文学视野的引进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文学世界的重建过程，蔓延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民族文学的产生，也因之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非洲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文学共同构成了20世纪文学生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世界文学的概念有赖于对非洲文学的深入理解，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都有过被殖民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成为了20世纪的文学主潮，亚非拉地区及其文学都是这个主潮下的波流。当我们把视野看向非洲的时候，我们会更好地了解中国自身。”这就涉及到了非洲研究对于中国的价值。

“对非洲的研究同时也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这是蒋晖提出的非洲研究的第三重价值。“我们的自我理解长期

以来借助于西方的镜像，因此，我们的文化振兴一直纠缠于古今之辨和中西之辨两个维度上，仿佛第三世界对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可有可无。其实我们忘记了，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和文学精神与第三世界的文艺运动产生了许多惊人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都曾推崇人民的文学以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比如我们都更加重视读者的问题，把为谁写作为文学运动的指南，这些都是第三世界依靠底层革命来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特有的文学现象。”蒋晖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回到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强调对生成这个东方历史场所的再认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形成一种正确的“自我了解”，这是引入“第

蒋晖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副主任。曾任夏威夷大学助理教授，南非金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英国文学、非洲文学、批判理论。

“三世界”视角的重要价值。

西方、非洲与中国： 研究非洲的三种方法

既然理解自我、西方都离不开理解非洲，那么我们如何研究非洲？“非洲文学不能当作独立学科来看待，非洲的文学研究不应该是只有非洲文学界感兴趣的一个小群体、小冷门的知识。”蒋晖在这里提醒我们非洲文学研究应有的定位。尽管非洲研究在中国还远远不是主流，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读者开始关心非洲的问题。这样的现状要求一个更大的视野：“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向中国知识界整体发言，而不能成为一个小圈子的小众学问。”非洲文学从边缘来到主流，这势必带来非洲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

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研究非洲文学，这是当今通行的方法。蒋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西方研究非洲文学的方法，目前基本属于后殖民研究范畴。后殖民研究是为西方整合自己在第三世界遗留下的文化资本、是为维持西方所乐意看到的世界文化新秩序而服务的。在借鉴其中的优秀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后殖民研究本身的各种局限性。”我们诚然需要系统地把握西方学术史脉络，但在进入学术生产之后，我们同时应该反思这种

学术史背后的遮蔽。

非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让非洲告诉我们什么是‘真’非洲”。“走向非洲做实地考察，与非洲学者交朋友、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研究非洲的必有的步骤，而且怎么努力去增加我们关于‘原汁原味’的非洲的知识都不过分。”蒋晖老师认同于这种学习非洲的方法，但他也同时提醒着我们这种方法背后可能存在的弊端，“走进非洲并不能意味着我们只能做非洲学生的学生。我们其实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非洲人是否完全知道他们自己是什

么？’非洲有三百年的被殖民历史，长期的殖民时代使得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人来阐释自身。欧洲的解释与全球化时代下自由主义的解释对非洲本土话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能信赖非洲人自己的表达呢？”蒋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即：“中国读法”，最根本的是要重新认识西方主流学界长期以来对非洲建立起的话语体系和认知方式，然而这种话语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在于非洲自我认知之中，也正因此，我们不能只通过非洲来告诉我们非洲到底是什么。“带着我们的视角与问题意识来理解非洲，当我们用中国的发展过程、革命经验、历史语境来理解非洲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独特的问题，洞穿话语的遮蔽。”“中国读法”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非洲，同时也在帮助非洲建立重新自我认知的坐标。“中国与非

欧洲的解释与全球化时代下自由主义的解释对非洲本土话语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能信赖非洲人自己的表达？

洲有着历史的相似性，通过中国的介入与中国学者的对话，非洲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的视角重新阐发自己对非洲的理解。”

这也就带出了第三种研究非洲的方法：独立自主的中国式非洲研究。

“如果非洲文学研究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灵感和新问题，那就是成功的非洲文学研究，否则，产生的让中

国文学研究者一点都不感兴趣的非洲文学研究就缺乏广义的社会历史价值；同样，好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必须为非洲文学研究者提供必要的介入非洲文学的维度，否则，中国自身的文明研究

无论怎么深入，也产生不了世界意义。它要和欧洲对话，也要和第三世界对话。”蒋晖在将非洲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文学中思考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学并置到了一个相似的位置上。正是这种相互参照带来了中国视角下非洲文学研究的价值。“找到一种对话点，将非洲问题和中国问题相呼应，将非洲研究变成中国知识界的热点问题，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今天，是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共同创建中国自己的关于文学的世界秩序的叙述的时候了。”在蒋晖看来，非洲文学与文化研究已然不是一个小众的研究舞台，这正是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要建立起有机而辩证的联系，而不应该‘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文学研究是非洲文学研究的天然保障，它为后者提供问题，方法和潜在的对话者；非洲文学研究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伟

大延伸，它让后者将世界内化于自身。”

“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与人才培养：非洲文学研究的未来

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带动着高校学术生产模式的转型。蒋晖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思考者，也是实践者。在2014年，蒋晖成为南非金山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在这一年中，他积极推进着在金山大学成立高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相关筹备工作。“金山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建立有十年的时间，而且在这十年里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们的起步已经晚了。”在这个意义上，高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筹措意味着某种当务之急。他帮助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到金山大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访学，进行了三次讲演，取得了极好的收效。“中非之间的人文互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汉办阶段，汉办的工作停留在语言的学习方面，然而要增进彼此的交流与理解，需要更深的文化把握，这需要高校和高等研究机构发挥作用。”以学者访问带动双边互动，让中国思考非洲，非洲思考中国，思维的碰撞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

除了筹措高级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蒋晖同时强调第三世界学者“知识共同体”的构建。“对非洲问题的思考是世界性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诉求让第三世界学者之间的碰撞显得尤为不同。”研究问题产生于不同知识体之间的互动，学者走出去才能找出这些问题。让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去，把非洲学者引进来，带动第三世界学者形成固定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中国



南非金山大学校园

的非洲研究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在现有的非洲研究学者之外，青年研究者的培养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如何培养非洲研究专家、非洲怎样建立更深层次互动的学术网，这涉及到人才培养上的问题。蒋晖认为，目前非洲急需中国文化专家，而满足这种需要的长远办法是非洲高校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尼日利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中文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非洲地区出现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需求，这是今后开始成立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客观基础。”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该走出去

帮助非洲高校完成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建立。

对于中国的青年研究者培养，蒋晖有着更高的设想与要求：“当代非洲青年研究者必须首先掌握一门非英语、法语的非洲本土语言。除此之外，他们要熟悉欧洲的非洲研究。最后，他们要对中国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有深刻的理解。”非洲、欧美、中国，三种资源与关系的互通带给青年研究者更广阔的视野。“这种培养有赖于中国高校中各种非洲研究项目的完善。”蒋晖认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参考，

中国文学研究是非洲文学研究的天然保障，非洲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伟大延伸。

它的培养模式是在四年博士培养期间，学生两年将在清华学习，一年在西方学习，还有一年在所研究的对象国学习，这种配置非常合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三个必备视角和知识的积累。目前，中国很多高校已经迈出了他们的探索步伐，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也在引领这个领域的研究。

“真正爱非洲的人们一定会希望从媒体看到‘礼仪’和‘文明’的再现。这种根必然在民间留存着，只是不能见诸于被西方精神控制的媒体。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在19日《星报》第八版终于看到这方面的呼声：‘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根’。”非洲文学的中国“读法”，或许正是在非洲与中国的寻根之旅上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合



本格·北海道大学

文 / 龙继伟



龙继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2013 级本科生，现于日本
北海道大学交换。相信每座
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
着被发现、被书写。

序

我是被“骗”来北海道的，这和两部电影有关——中国导演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我个人对旅行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看完这两部电影后，我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来北海道旅行。

2015 年 9 月中旬，我踏上了札幌的土地，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北海道。我将在这块梦想之地生活近一年——我想，已经足够了。

随后的几天，札幌刮起了台风。走在街上必须随时带伞，因为大雨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袭来。然而，台风天里伞却是无用的。我记得刚把伞打开的时候，伞立马被强风撕坏，我只好在大风大雨中与另一位中国学生挽着手艰难地行进。

如果当初电影里也有这样的画面，我一定不会来这里。这就是“骗”的由来。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来了。

“北大”之秋冬

在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简称是“北大”。因此，也可以说这次交换之行不过是从一个北大到另一个“北大”而已。

10月份，校园里的枫叶变红，银杏变黄，面对此景，我找不到什么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学校很大，拥有自己的植物园和牧场——想来鲜有如此“霸气”的大学吧。在学校的主干道上，可以欣赏路旁的红叶；等到深秋，黄灿灿的银杏一样十分醉人。

有一次雨天，我从一棵枫树下经过。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小枫叶被雨水打落在地，好似一颗颗星星，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之境。如果是晴天，学校里的银杏大道则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对美的向往。蓝天之下，银杏叶在树枝上如花般尽情绽放，又随风飘落铺满大地，引得游人驻足拍照，流连忘返。

秋是短暂的，而冬却是相当漫长。

11月24日，札幌迎来了第一场大雪。早晨醒来的时候，看到外面已经白茫茫一片了。“来北海道，不过是为看雪。”我在相当大程度上认同这句话。下雪，对于北海道而言，好似在进行着某种宗教仪式。说不上为什么，总感觉大家对雪有种特别的向往，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雪的人来说。在《情书》里面，女主角在雪地里行走的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在苍茫的世界中，唯听到自己于雪中行走的脚步声与喘息声，仿佛处于静止而又流动的时空中一样。像谜一样让人着迷，这是一种浪漫情怀。

事实却并不是那么浪漫的。看到齐膝盖深的雪，绝对是人生第一次；但雪花带来的兴奋并没持续多久，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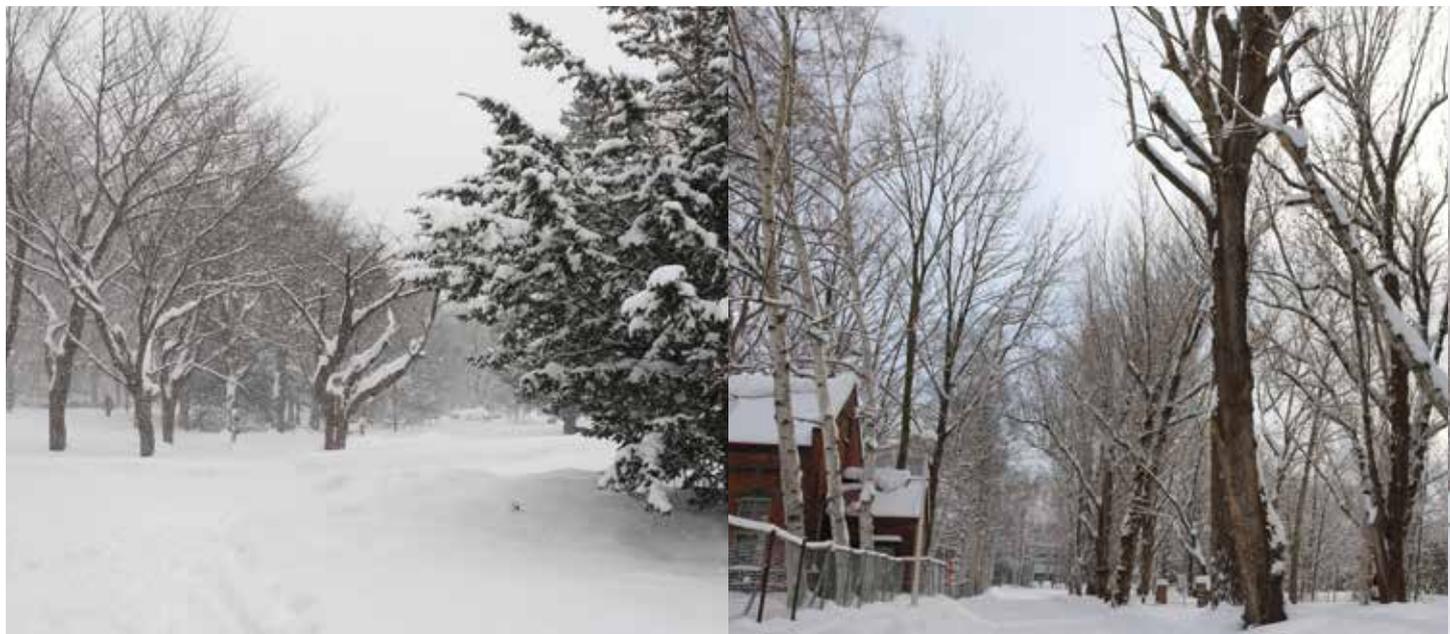
📍 10月上旬的札幌街道



📍 11月下旬的札幌街道



📍 11月下旬的校园主干道



为之后路面开始结冰、变滑，每个人都在深刻体会着“步履维艰”的意味。比如今天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就摔了跟头；后来在校园里的雪道上，还看到三四个人也摔了跤。这摔跤大概会成为冬天里防不胜防的常态吧，并且要一直持续到来年三四月份之久。

更残酷的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如何忍受没有活力的雪天。“今天应该有很多人堆雪人、打雪仗吧！”——第一天下雪的时候，我这样期待着。等我到了校园，只看到匆匆的行人，并不见有什么人玩雪。“可能别人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只好这样对自己解释道。

但我还是不甘心，怎么可以浪费这么大的雪呢？所以我试着“怂恿”几个留学生去玩雪，大家都以“冷”来拒绝我的请求。无奈，我只好一个人去堆雪人。把手伸进蓬松的雪里，抓起一大把雪，双手合并努力挤压成一个雪球——不出十几秒的时间，我

就把手中的雪球丢到雪地，拍拍手后把手揣进口袋取暖，因为真的太冷了。但我还是不放弃，又拿出手来，重复了好几次，终于堆了一个不知是何怪物的“雪人”，满心欢喜地离开了，但依然不禁大呼——“好冷”！

留学体会

来日本后，有一次我跟在静冈的同学聊天，我说：“这边就像是大森林一样。”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是札幌的自然环境。北海道大学有如小森林，内含小溪、水池，又有若干草木、动物（绵羊、奶牛等）；而整个札幌则如大森林，城市中心和郊区有众多公园，街道又多树，加上平时看不到什么人，因此才有这样的感觉。

二是札幌的文化氛围。说到“日本”，外国人的脑海中往往出现和服、木屐等画面；而在北海道，这样的画面几乎没有。北海道在明治时期才开

始开发，因此跟日本本州等地区相比，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而影响所谓“日本风”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海道寒冷多雨的气候环境不适合穿和服、木屐，更别提住在漏风的和式房屋了。从这个角度说，来北海道仅仅算是来北海道而已，跟“来日本”是有差别的。当然，也可以说北海道代表另一种“日本风”吧。

说到北海道文化，就不得不提“阿伊努”了。阿伊努人是北海道的原住民，拥有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北海道大学里有时会举办一些了解和体验阿伊努文化的活动；在书店里也能找到学习阿伊努语言的教材，只是现在以阿伊努语为母语的人不超过10人，这种语言面临失传的危险。

不过好在这边也说日语，而且没有特别浓重的口音，否则学一口“北海道腔”回去就惨了。

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图书馆的质量扮演着重要角色。



北海道大学的图书馆有两个：“本馆”是最大的；而“北馆”相对来说藏书量小一点，但是有很多关于语言学习的书籍，再加上它比较靠近“留学生中心”，因此留学生大多在“北馆”学习。

“北大”图书馆不属于富丽堂皇的类型，但是在“人性化”方面却做得很好。拿自习区来说，就可以分成很多种类：讨论区可以说话，十分适合用来小组讨论；“本馆”的普通自习区配有隔板、台灯和插座，很适合一个人安静地学习（不过大多都不能使用电脑，因为敲击键盘会影响到别人）；也有单独的隔间式自习区，但位置不是很多；语言学习区则是单独的小房间，可以在里面练习发音、听力等。可以说，这样多功能区分的设计满足了不同需求的人。

据我的观察，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边阅读纸质报纸的人很多。在图书馆阅读报纸杂志的区域，总是能看到有学生或是老师在看报纸。即

使在网络发达、信息量爆炸的今天，依然有很多纸质媒体的忠实粉丝。有的日本报纸，比如《读卖新闻》，每天不止发行一次，分为早报（朝刊）、晚报（夕刊）等。我们宿舍的公共厨房里，每天都有《读卖新闻》报纸的更新，我偶尔也会从上面找一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来读。

此外，图书馆还有专门用来接打电话的封闭小隔间，这样就不像国内的某些大学，学生在走廊过道或是厕所里，甚至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在自己的座位上接打电话。下雨的时候，图书馆入口处提供免费伞袋服务，这样就不会把雨水带进图书馆了。一切细节都体现出人性化的设计。

关于北海道大学申请

北海道大学是日本七所帝国大学之一，拥有“日本最美校园”的美誉。通过我的亲身体会，我觉得在“美”

的方面确实名符其实。

现在，北海道大学每年有5个名额给北大，其中2个日语项目，另外3个英语项目；5个名额均可申请奖学金（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和日本JASSO奖学金），具体可能视不同项目而定。

申请工作一般从11月开始，到来年的9月拿到“再留资格证”才算完毕，可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申请本身却并不麻烦，准备好了推荐信和语言资格证明，剩下的就是静心等待就好。

我所上的日语课程，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日语和日本文化两个方面，也可上“全学课程”（类似于北京大学的通选课）；在课程难度上，需要根据分级考试结果来决定，一般分为中级和上级课程（初级课程主要是面向参加英语项目的同学）。

因为是交换留学申请，而且申请来北海道大学的人又不是很多，所以被拒的情况鲜有发生，可以大胆申请！

学术盛宴，人文关怀

——孙拓眼中的“伯克利加州大学领导力培养计划”

文 / 项苏楠 刘纯懿 王子怡



伯克利加州大学

孙拓，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系 2012 级本科生，2016 年度中美“富布莱特”项目国家公派研究生（全国仅六名本科生），专业综合排名第一，2015 年度“国家奖学金”得主，2014 年长篇小说《蝶羽凤凰》作者，曾获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现为“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验计划（珠峰计划）”成员。2015 年 6 月底，他前往美国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参加了为期三周的“环境科学前沿领导力培养计划”，这场环境学界前沿领导力的学术盛宴给孙拓带来深刻的感触。在与所有其他 34 名成员合作、竞争的过程中，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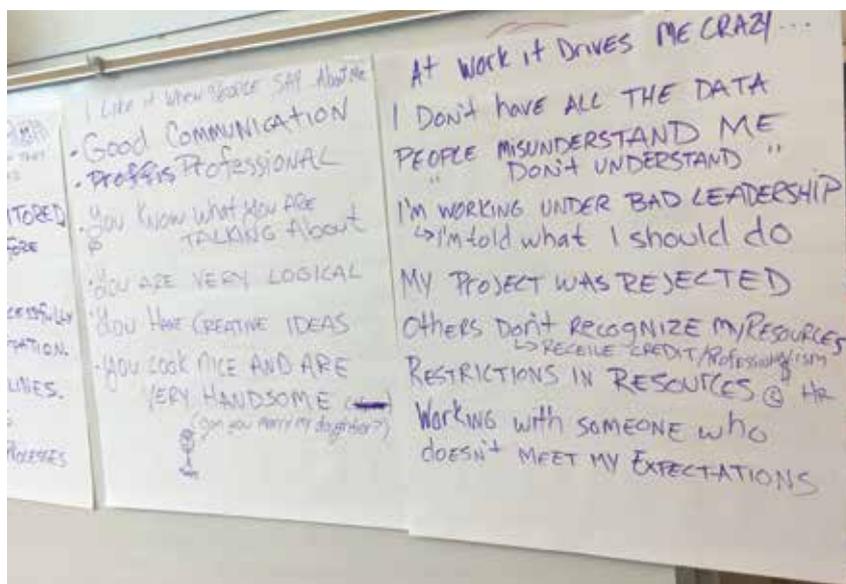
收获颇丰。用国际的视野、理念、方法，来解决本国的危难，是每一位富布莱特学者的最高目标，他也因此下定决心，要继续探索世界尖端的健康医学与环境控制技术，有效改善国内的环境质量。

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环境科学前沿领导力培养计划”（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 ELP）是一场国际学术论坛，以资深的专业教授主持的讲座为主，穿插以与会者的自由讨论与实地考察。论坛时间仅短短三周，日程紧凑但开

展形式多样，每周都有不同但又联系紧密的主题及活动。

课程模式共有三种，分别是讲座形式的教师授课、限时的小组讨论和展示，以及成员间互动与合作的训练性课程。孙拓对限时的小组讨论记忆犹新：“这一类的限时展示与我们平时所接触的 presentation 有很多差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限时性’和‘随机性’。‘限时性’体现在我们只有短短的 15 分钟，在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情况下进行 brain storming，结束后进行汇报性展示；‘随机性’在于每一次的小组讨论都需要随机分配小组成员，讨论的主题也是随机的。”



孙柘小组的讨论报告

项目中进行的各项实践活动。“这段时间在伯克利所学的知识都是立体的，因为任何一门实用性的课程都有着实地实践作为巩固和延伸，使得新习得的理念能够更深刻地被理解。”孙柘说。

在介绍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美国当前的物种保护现状之后，教授带领他们参观了盐湖南岸自然保护区（South Bay Salt Ponds Restoration），穆尔森林保护区（Muir Wood National Monument）和萨丽娜山谷农业区（Salinas Valley Agricultural Area）三大景点，其中前两者均为自然保护区：野生鹈鹕自然保护区和美洲红杉自然生态保护区。参观途中，教授一边讲述有关动物们的有趣故事，一边引入学术理论加以探讨。每一次参观都似一次旅行，体验新事物的同时促进对现实的思考。

在整个 ELP 项目中，孙柘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自己关于科研项目 and 未来展望的一次学术报告。他说，这个学术报告不仅是介绍自己的此前研究，还可以通过报告使其他成员对中国的

固有印象有所改观，让各国代表认识到中国在环境研究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在这样的考虑下，孙柘选择以全国农业土壤持久性致癌污染物的风险评估为主题，希望以准确的实验数据证明中国农业土壤的工业污染指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低水平这一事实，以此表明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最近十年的成效与未来的决心。他所用的 PPT 完整版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曾用于其他学术场合的讲解。这次，他决定挑出最核心的 3 张展示。

练习过程中，孙柘对讲演内容一字一句地加以斟酌，掐着秒表反复练习，甚至算好听众可能开小差的时间，在此时加入一些笑点。最终，孙柘以穿插其中的高雅幽默和清晰深刻的图表内容博得了满堂掌声，并被冠以“最令观众难忘的两个演讲之一”。

“这次成功的 presentation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告诉世界中国正在摘掉‘污染大国’的帽子这一重要信息的绝佳契机。”孙柘欣慰地说。

另一个创意便是其评判小组展示的标准：在每一个小组派出一位组员对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展示后，有一个环节是让该组组员进行补充，组员补充内容的多少也是影响最终评分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组员补充的内容很多，就说明讲演者没有将组员的意思全数记录、理解和表达。也就是说，教授不仅仅会考评同学们将这个问题阐述得多深刻、多清晰，还会考察组员在讨论中是否认真倾听，是否尊重每一位组员的意见，并有效地记录和表达出来。这一点同样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品质。

授课中第二个比较有特色的是在



参观有机农庄

人文关怀与师生情谊

谈起在伯克利相识的各位教授，孙柘语速渐缓，面露微笑。

孙柘在伯克利度过的第一个周末便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晚，狄安娜（Diane）教授一家邀请孙柘共赴晚宴。为了接待孙柘，狄安娜教授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在吃饭间她讲述了许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与生活的故事和经验，并和孙柘一起探讨中国传统文学、中华成语和历史典故等等，相谈甚欢。

晚上九点，狄安娜教授提议驾车带孙柘参加焰火晚会。晚会格外的壮观，虽然焰火由于雾霾的遮掩只能呈现出朦胧的色彩与轮廓，但震耳欲聋的汽笛齐鸣声与群众齐呼“U! S! A!”

的呐喊声一直回响在孙柘的脑海，让他久久感慨于美国公民对祖国狂烈的热爱。

对中国孩子有着深厚感情的苏珊（Susan）教授，曾在年轻时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孩并将她们抚养成人。在了解到这次项目中有来自中国的孙柘后，她便立刻邀请孙柘去家中做客。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孔孟文化，到人才济济的上海、北京，他们无所不谈。

一次，苏珊教授受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佩琪（Paige）教授所托，请孙柘帮忙给佩琪教授的两个孩子取中文名。佩琪教授的一个女儿叫“Ruby”，孙柘便给出了“露比”与“璐比”两个建议，并为她解释了中文同音字的不同寓意和内涵，比如“露”代表露水，象征着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淳朴洁

净，而“璐”则是一种玉的名字，象征着高尚的品格与尊贵的身份。最终，佩琪教授选择了“露比”，并在邮件中回复：“女儿就像是大自然的精灵，非常感谢孙柘同学的帮助”。不仅如此，孙柘还热情地为佩琪教授和她丈夫各取了一个中文名，让教授夫妇颇为感激。此后，佩琪教授常常邀请孙柘做客，教孩子们说中文，并主动提出帮孙柘修改出国申请文书。

除了教授们的热情关怀，让孙柘大为感动的是，苏珊教授对中国的喜爱不仅因中国五千年绚烂的历史文明，更因为中国孩子出众的实力。“中国的孩子其实真的很棒，完全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缺乏创造力，相反，中国学生总是会提出一些创新味十足的想法，只是他们中的好多不够自信，自己就先否决了自己的创造性。同时，

在社会氛围层面上进行分析，中国的好多领域缺乏赏识中国学生创新性想法的慧眼。”在她看来，这内外两因导致了“中国学生没有创造力”的误解读，甚至是偏见。

正因如此，苏珊教授的两个中国养女如今都在中国工作，她说：“尘归尘，土归土，是中国人，终究还是要回去的。”

始料未及的自由与热情

“在城中心，目之所及都是高楼大厦。”从机场前往建在山地的伯克利分校，孙柘坐在城际快轨远望一路上的风景，“但与中国鳞次栉比的建

筑排列不同，旧金山的建筑间空间很开阔，不会给人压抑的逼迫感。”

惬意是孙柘对旧金山的最初印象。除了绵绵的细雨、温煦的阳光，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其中折射出的生活情调更打动他。在这里，健身、遛狗的悠闲身影更多地代替了行色匆匆与车水马龙，行人比汽车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甚至红绿灯都可以由行人手动叫停。街道上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会带着灿烂的笑容主动打招呼。路边有人遇到麻烦，他们也很愿意停下脚步给予帮助。

令孙柘印象最深的是他逛商店的经历。由于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英文名称不够了解，孙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向店主解释。寻找塑料脸盆是最困

难的，孙柘用“plastic basin”、“used for cleaning your face or washing clothes”比划了很久，店主依然困惑不已，但他一直耐心地与孙柘交流。几经周折，孙柘才明白由于美国人认为塑料含有大量的致癌物，他们对塑料脸盆并不推荐，因此几乎所有的日用品店里都没有塑料脸盆出售。在店家的帮助下，孙柘最终在日本 Daiso 店中买到了脸盆。购买齐全后，店主与孙柘谈起了天，还非常热心地教孙柘下载、安装了一个购物 App，教他使用这个软件搜索附近商场中出售的所有货物。

人们的热情友好增添了孙柘对这个城市的好感，时不时在路上遇见的中国老乡，令旧金山更显亲切。孙柘的住宿区附近有一家广东人营业的中餐馆，孙柘临行前一天，老板一家人主动邀请他来餐馆全天免费吃饭，这让孙柘感动不已。

孙柘抵达旧金山恰逢六月底，当时正值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久，旧金山市区中心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游行。游行规模宏大，参与者上至五、六十岁的老人，下至 10 岁左右的儿童，所有人都穿着相同的印有“Foreskin”字样的衬衫。队伍按照之前规划好的路线，在不同的街道、不同的时间节点为观众们表演，从热情奔放的现代舞、优雅舒缓的交谊舞，到充满民族风情的各国精彩歌舞。游行队伍还会向围观民众发放纪念品和礼物进行互动，情绪激动的观众往往会参与到游行队伍中共同狂欢。在孙柘看来，这场游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美国人内心深处饱满强烈的公民意识，以及运用合法手段来表达自己权利诉求的能力与追求。合



成员们对孙柘展示的高度评价



文化记忆：理论旅行与跨学科讨论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北大讲演录

文 / 许瑞

11月29日下午，应北京大学与歌德学院（中国）的邀请，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做客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分别发表了题为“一神论的起源与未来”和“现代时间管理机制的兴起与衰落”的公开演讲。当晚，阿斯曼夫妇还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社科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进行座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担任上述活动的主持，社科院哲学所王歌博士担任翻译。

演讲开始前，黄燎宇教授分别介绍了阿斯曼夫妇对“文化记忆”理论所做的贡献。文化记忆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一批旧约研究者、古埃及学家、亚述学家、古典语文学家、文学研究者和语言学家启动了“关于文学传播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力图从远离当代和本文化圈的角度去研究关于文学文本的考古学。该项研究认为，信息无法直接传播，而必须有将信息外化为存储物、存储过程和存储物重新转化为信息的环节。

这种信息的存储和异时空的重现实际上就是记忆与回忆。

阿斯曼夫妇是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扬·阿斯曼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埃及学专家，神学家和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教授是德国著名英美文学专家、埃及学者。两人在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中虽然一直合作，然是有明确的专业倾向和研究分工。扬·阿斯曼主要是用文化记忆概念来描述古代文明的传承和阶段性特点，阿莱达·阿斯曼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扩展，建立起复杂的概念体系，用于分析现当代文学及其背后的文化历史内涵。2015年，扬·阿斯曼的经典论著《文化记忆》被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成为译介文化记忆理论的重要里程碑。

扬·阿斯曼： 一神论必须保持自我克制， 全球化世界中各宗教的和平 共存才可能实现

扬·阿斯曼首先澄清了作为特定宗教形式的“排他式”一神论，与“众

神汇同”的一神论形态区别。排他式一神论否定了世界的神性，可被看作相对于多神论而言的无神论。它具有一种否定多神的“读神”的能力，这种能量在最后也会朝向其自身。一神论的“一”包含一种讨伐、否定与排他的元素，同一切与其真理不相容的进行抗争，遵循严苛的区分与排他。而在宗教与文化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正是一神论中区分的排他性以及真理的绝对性。

其次，他指出了排他式一神论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两重渊源，并将其区分为“忠贞一神论”与“真理一神论”。

忠贞一神论起源于北国以色列的盟约思想与出埃及的神话，以十诫为中心。盟约神学是忠贞一神论的代表，神与祂所拣选的盟友间的盟约是一部爱的盟约。这种形式的一神论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也可称之为“情绪型一神论”。忠贞一神论不是哲学反思与知识，而是激情昂扬的责任感。这种一神论明确承认其他神的存在，并且恰恰以此为前提，要求信徒的忠贞。与神结盟及其所要求的排他式忠贞是一把双刃剑，赐福与诅咒、生与死、



慈悲与愤怒如影随形。

忠贞一神论对敌我的严格区分，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在现代仍有深远的影响。阿斯曼先生提到，忠贞一神论不宜被称为一神崇拜，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现象，而不是宗教史上的普遍现象。最初，它是人们在遭受灾难性创伤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一种神学构想；而对以色列来说，在亚述和巴比伦的长期压迫、征服与囚虏之下，偶发式一神崇拜变成了一种持续状态。由此可以理解，先知何西阿的“反迦南主义”首先是一种皈依现象，排除自身历史中的异类；这一倾向在新约的反犹太主义中发扬。继续发扬这一倾向的还包括其他一系列自视为出埃及的殖民主义运动，它们征引相应的旧约篇章，将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为入侵中立国比利时找的借口便是征引《申命记》。但是扬·阿斯曼认为，这些行为已然触犯了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放在今天，这一诫命的意义就是：不可借宗教之名行政治暴力之实。

真理一神论是一神论的另外一种形式，它只承认唯一一位神祇，除此之外别无他神。这种一神论又可以被称为“认知型一神论”，它与知识有关，与忠贞无关。对待谬误和非真理时，“认知型一神论”的武器不是身体上的暴力，而是口

诛笔伐的讽刺。它暴露别的宗教荒谬的弱点，将其塑造成精神错乱的后果，揭示这种精神错乱正是未蒙启示之光照耀的外邦异教的显著特征，而一神论则予人启蒙。

与忠贞一神论相仿，真理一神论对“启示”的信念亦在历史中多有体现。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对异教无异是发动了一场语义毁灭之战。异教已经不是宗教的另外一种形式，而是不信教，是罪。教父们的这一做法，最初是为了禁止造像。而阿斯曼再次强调，这恰恰走向了反面——他们违反了“禁止造像”一条，因为这一讨伐其实是在为敌人造像，出于对他人的敌意而造出走样的刻板印象。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与视作谬误的一切不相容自然合情合理；但如果宣称认为自己认为不相容的一切并不真实存在，而仅仅是造出来的像，是怪诞失真的讽刺画，那么，自己掌握的真理也就站不住脚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借“忠贞”之名行暴力之实，还是以推崇“启示”丑化异己，各种形式的宗教暴行在当代依然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文化与宗教密切接触的全球化世界，一神论对区分的严格要求以及对真理的绝对掌握恐怕持续不了太久，势必要做一些让步和妥协。但问题恰恰在于，在新保守派与原教旨主义抬头的现状下，一神论究竟何去何

从？扬·阿斯曼是从海德堡大学荣休的驰名国际的埃及学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及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员，他与同为埃及学家、文学文化研究专家的学家的阿莱达·阿斯曼一道，自1970年代末开始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并由此享誉国际学术界。阿斯曼著有《出埃及纪：古代世界的革命》《摩西的抉择：一神论的代价》等书，先后荣膺德国历史学家奖(199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2006年)和托马斯·曼奖(2011年)。

从？

扬·阿斯曼认为，可以从前人的做法中得到启迪，在教理上找到使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方案。

对于严格区别敌我的忠贞一神论，早期犹太教已经发展出了一条对立原则，即“律法书同客居国文化一道”(torah·mderekheretz)的原则。在十九世纪，参孙·拉斐尔·赫希(Samson Rafael Hirsch)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将犹太宗教虔诚同德意志文化结合起来的革新运动。因此，忠贞一神论所要求的绝对忠贞与其他文化并不矛盾。

真理一神论面临的问题则在于它所坚信的启示概念。但是，在东叙利亚基督教牧首提摩太的珍珠比喻中，启示对占有真理的要求不是绝对的。真正的“珍珠”一定存在，只不过此世生活中，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确定自己是其拥有者，每种宗教都应意识到，“珍珠”有可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莱辛《智者纳旦》中的指环寓言也表明，宗教启示虽然存在，但它们并不互相排斥。真理和启示这两个概念必须重新定义，以让其他真理和启示不被排除在外。对于真理一神论而言，对他人的认可需要建立在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并在信仰实践中把启示视作真理来指导自身行为。

扬·阿斯曼最后总结道，全球化世界中一神论的未来，就存在于这些自我克制的形式

中。宗教只以复数形式存在，而一神论的神是隐匿的。究竟该信哪种宗教、哪个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也许永远不会达成共识。但如何才能在全球化世界共存，就这个问题人类必须达成共识。如果仅从宗教角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只能从世俗的人权法典角度来回答。一神论与宗教的未来皆取决于它们向这一世俗标准看齐的能力。

阿莱达·阿斯曼： 未来不能以往昔为代价，而 往昔也不可能以未来为代价 发展自己

随后，阿莱达·阿斯曼做了题为“现代时间管理机制的兴起与衰落”的演说。哪些是我们回忆的场所？是什么将我们的回忆联系起来？过去的记忆机制是怎样的，又如何被打破？她的专著《时间分崩离析了吗？》从宗教的“进步”观念谈起，通过历史中的

分析来研究这一记忆机制的特征及其演变。她认为，对文化记忆的持久建构，不仅构成了西方文化长久发展的驱动力，也能在某种意义上切中当下的中国问题。

每一种文化价值，深刻地体现在与之相应的观念中。而现代性的时间观，是对前现代时间观的一场革命。在未来主义者眼中，“现代化”所代表的解放与更新的动势，与“僵化”“泥古不化”的传统针锋相对。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主义通过宣告与传统的绝然断裂，号召人们从崭新的时间观念中，汲取创造未来的力量。区别于循环、直线性、同宇宙相连的前现代时间观，现代的时间观关注更细致的现象，“当下”本身就蕴含着价值，预示着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

时间观所构成的体系，也就是“时间管理机制”。它以文化为基础，植根于国家机构和社会成员的感觉之中，

人的思考、计划、行动以及人的感觉，均以此为准绳。这一机制在现实中具有某种规范力量，并随着“目前状态”的变化，不断进行着自我建构。

阿莱达·阿斯曼将时间管理机制归纳为五个方面：时间的断裂，关于开端的虚构，创造性的摧毁，发明“历史现象”，以及变化的加速和博物馆化。五个方面彼此相关而且互为基础。它们被分为两组，前三个方面以“努力谋求的进步：老化与更新的逻辑”，与后两个方面所体现的“被减速的进步：更新与保存的逻辑”相分别。“现代化”曾通过对传统的区分、分离、遗忘和废弃的模式体现，但在这里，通过两组相对的时间管理模式的逻辑，“现代”与“过去”又重新被关联在一起。

在这一基础上，要重新理解过往与未来的限制。“正如未来成为了防备的对象，往昔也日益成为需要修缮的对象。”我们不仅要问从过去和未来中，应当期待什么，而更要问，往



昔和未来对我们有何期望。建立新的纽带，需要得到过去经验的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往昔”不只是问题重重的负累，更是为“未来”提供的资源。它作为“当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回忆起曾经的榜样和成绩，以及曾经的罪责和失败。没有往昔，身份认同就无从谈起。

最后，阿莱达·阿斯曼再次强调，即使身处现代意味着人们有权力和自由“将一切付诸实现”，但未来不能以往昔为代价，而往昔也不可能以未来为代价发展自己。充满新事物和可能性的未来，也许要更多地通过传统的文化得以成为现实。

“构建历史视域”： 跨学科座谈



当晚，阿斯曼夫妇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五位中国学者进行了名为“构建历史视域”的跨学科座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彭刚教授讨论了历史记忆的伦理维度。他认为，对记忆的理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其作为过往经历的遗存，一种是将其作为受到当下诸多因素影响的对于过往经历的建构。当下学界更多地强调记忆和当下相关，但在他看来，阿斯曼夫妇在考察记忆受制于当下的因素的同时，强调过往经历对当下记忆的塑造，对于历史学而言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有两重价值。一方面，“沉默的大多数”中很大一部分人以及他们的经历，除了记忆之外就无法以其他方式进入历史，

记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触及过往的历史；另一方面，如同阿斯曼夫妇所言，当下的“记忆热”和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战争、种种政治社会的劫难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受难者的创伤性记忆得到人们的倾听和记录，这本身就具有某种伦理价值。受难者的苦难记忆可能会经历不断的修改和再现，很可能对于历史认识而言价值极其有限；

但是在这个时候，单是对记忆的倾听就成为了某种道德义务。此外，我们会看到，在一个社会疗治创伤的时候，似乎没有充分揭示过往社会政治劫难的“真相”，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解”，就此而论，人们就应该避免遗忘而唤起记忆。但在有的情形下，似乎又真的存在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情形，所以在有些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困境：没有充分的记忆似乎无法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但是没有足够的遗忘，似乎又无法在政治上作出选择和继续前行。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副教授则从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了问题。他介绍，道教学界一个重要的争论是，在处理信仰历史的时候，应当相信历史的记载还是经典的记载，还是选择二者的结合。而无论从信仰还是文本出发，目标都是获得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其本身是依靠某种意义符号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记忆就在历史叙述中产生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加工后的记忆符号被应用于历史的时候，要如何平衡文本和历史的关系，在平衡的同时如何形成历史叙述的合法性？

另外一点是，从道教实践出发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与神圣相遇”这些具有宗教价值的记忆被要求保持缄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于神圣经验的宗教真理记忆如何进入我们文化类型学的框架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提问，似乎是另一个层面的伦理问题：记忆作为个人行为进入历史叙事的时候，在个人价值观和社会历史的需要如何达成一致，这是社会的道德义务还是个体的道德义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则

通过新疆山普鲁出土的两幅挂毯画，介绍分析了一个人类文化遗产与变革的“奇迹”。挂毯所叙述的，是一求助型的史诗。出现在挂毯上的神灵，保存了对苏美尔和亚述文明的记忆，整合了希腊神话的多个传说。而这些传说故事曾经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最终，体现了古代伊朗宗教信仰的天树和具备苏美尔、亚述文明之女神特征的娜娜女神实现了史诗中英雄的所求，令凡人走出冥界。挂毯的画面以明晰而生动的叙述，烘托出曾经生活在新疆和田地区的古代民族的信仰，以聚合了多重文明的形式，描绘了超越生死的神话母题。段教授认为，这一实例对文化记忆的理论以及文化遗产之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北京大学历史系朱青生教授针对阿斯曼先生书中的观点，对图像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提出了另外的看法。阿斯曼先生在书中表示，以图像或神庙保存文明的形式不如以文本保存文明的形式更有效，埃及文明的消失与希腊文明的存续也与此相关。然而，希腊文明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也存在于埃及文明中，甚至时间更长。

这一问题在今天尤其有特殊的意义。随着我们进入图像时代，文化的传承和记忆恐怕会主要靠图像而不是文字，这样，图像还有另外的功能，即以“消除记忆”和“追求永恒”作为目标，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这种形式得以长久保存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书法和宫殿。书法不仅展现了文字的图像性，更重要的是，书法的技法可以独立于内容，变成人的内在感觉，并且变成超越记忆和历史的纯粹的方面。汉画中的理想宫殿，也在明清宫殿（故宫）中遗存。这是中国



完成文化遗产的独特方式。

阿斯曼夫妇对各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分别给予了回应。阿斯曼女士认同彭教授关于两种理解记忆的方式的区分，但针对记忆的两种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历史书写作在当下的回溯，选取记忆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记忆的可靠性，而是为什么这段记忆被需要；对于“倾听”的伦理义务，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见证”，它关乎受害者能否被倾听、认可以及证实。

对于程教授的问题，她认为个体记忆需要被记述才能成为历史的、文化的一部分，而即便是仅涉及交往层面的个体记忆，也不是与集体记忆绝然隔离的，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了框架。

对于段教授和朱教授都提到的图像，她认同图像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可以展现特定人群在历史中的文化遗产。而与文本不同，图像可能不易找到确切的年代，因此需要在美学上具备更大的完满性。而中国书法的微妙，似乎与这句箴言有共通之处：“灵魂要说话的时候，就是一声叹息。”

阿斯曼先生补充说明了两种历史书写的姿态，一种是考古的历时性的

编年史式的，另一种是共时性的综合的，更偏向叙述性的。彭教授的看法更接近后者，而阿斯曼女士的看法更接近前者。过渡到程教授的问题，每一种历史的资源，都要依靠自己的符号学系统进行辨识。雅各布·布克哈特说过，能够获得最大确定性的是当时的物件和文字，而非在转述或者誊写中发生变迁的文本。对古物的保存，是他认为中国文化非常了不起的方面。他还对道教实践中这一缄默传统表达了兴趣，因为这与西方一神教中需要宣讲神迹的情况相反。

对于段教授的重大发现，阿斯曼先生表示，挂毯画中对“冥界之行”的叙述采用的可能是一种记忆领域中所称的“图像综合”的方式，来使自身含义更加丰富。

阿斯曼先生从古埃及学者的角度，提到了两大文明古国在文字图像性上体现的共性，来回应朱教授提到的文本和图像的关系。他认为，古埃及文字的图像性特点有利于文化的一贯性，也为了供后世更好地识别。神庙也是类似的道理。中国文字的图像性，似乎也存在这一倾向。合

[观点] VIEWPOINTS

为了下一代人的气候正义

——全球气候变暖研究之父詹姆斯·汉森
眼中的气候与政治

文 / 祖晓雯



12月21日，应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提名和邀请，刚刚在巴黎参加完COP21的詹姆斯·汉森教授作为北大“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入选学者，于12月21-22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公开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气候变化的机遇与挑战：通向清洁能源与稳态气候的可行之路》。

今年已经74岁的汉森教授，大部分时间任职于美国宇航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GISS），曾任所长32年（1981-2013）。2013年从NASA退休后，汉森继续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并主持气候变化、认识与应对项目。汉森教授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先锋学者，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学家之一，被尊为“全球变暖研究之父”。

他于1981年在Science发表的文章首次使公众意识到了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气候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成功预测了气候变化的趋势。他的一个最知名的工作是1988年在美国国会为气候变暖作证，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汉森教授除了在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方面的卓越研究贡献以外，他本人还有两件标志性的争议事件。2006年，他在美国的60分钟节目里告诉大家，乔治·W·布什的那届白宫政府曾经在与气候相关的新闻发言里修改了全球变暖问题的相关报告，修改后的版本让全球变暖问题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但他本人参与领导的未经修改的报告指出，全球变暖问题威胁巨大。他甚至宣称，如果没有美国官方的批准，他就无法在气候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在自己的



詹姆斯·汉森教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公开演讲 刘学红 / 摄

职业生涯中从未经历过这种级别的限制。

2011年8月，他和另外1251名气候变化积极分子因为在白宫门前参加反对从加拿大到海湾地区建设输油管的游行而被捕。2013年2月13日，他再次在白宫门前被捕，依然是因为参加进一步抗议该输油管建设的游行。

就在汉森教授访问北大前不久，12月13日，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虽然该协议已经达成，但是不少学者认为，各国还需要制定详细的政策和措施，来促进该协议的顺利实施，汉森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增加碳税”的建议和言论至今仍备受争议：对石油公司等能源企业增收“碳税”，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然后将征收的税款平均分给所有的公众。

谈及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协议中扮演的角色，汉森教授肯定了中国政

府此次的努力和贡献：“是的，中国此次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对能源需求很大的国家，中国此次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虽然目前，空气污染是中国比较首要的难题，但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也十分紧迫，中国绝不能等到先解决了污染问题，再来着手解决碳排放问题，那就太晚了。”

中国和印度同样是世界人口大国，同样遭受着空气污染问题的困扰。汉森教授表示：“中国在治理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角色要比印度重要，而中国采取的态度也比印度积极很多，我认为，中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国家。”

汉森教授此次带来了跟随他大半生的著名的“帽子”。这帽子是20年前他带家人去巴黎旅行并小住一周时，妻子送给他的，帽子跟孙子喜欢的童话故事中的帽子很像，跟随他大半生，和他走遍了世界的很多角落

以下为专访内容全文：

记者 = **R** 汉森 = **H**

R：从 1988 年，您作为 NASA 的首席气候科学家，也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学家，第一次警告国会，关于全球变暖给地球带来的威胁，到现在，您认为这个问题发展得怎样？解决得如何？

H：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严重，冰川融化，海平面每年上升，近五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得更厉害了。可以说问题一直在恶化。

R：您对本次巴黎气候大会各国达成的协议如何看待？

H：此次全球近 200 个国家，包括欧盟所达成的控制全球温度升高在 2 摄氏度以内的协议虽然达成，但是各国领导人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暖，持续的气温升高带来的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问题带来的破坏同样严重，直到现在，美国和欧洲等各国的政府都只有承诺、空话，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在阻止全球变暖的恶化，没有任何政策和实际性的措施真正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科学家们一直对全球变暖问题非常警惕，作为科学家，我们需要对此有客观的态度，但是我本人经常受到阻止，不让我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持抵制态度。

你可以看到的是，每一个国家都说要减少碳排放，但是其实各个国家间联系并不多，而且同时，还是继续使用最便宜的化石燃料作为供能能源。其实他们并不是最便宜的能源——如

果你把他们对社会的消耗计算进去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要增加碳税，尤其是对一些国内的矿厂和进口港口（这些只是小部分的地方，很容易做到）。这是真正有用的减少碳排放的措施。

R：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您的“增收碳税”的政策主张具体怎么实施吗？

H：这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政策，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钱应该给予到公众，从燃料公司收的费用公平地分发给每一个人。这个费用的额度应该随着时间增长，而且应该 100% 给予到公众——每一个合法的居民都应该得到同额度的钱。

阿拉斯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你看，在阿拉斯加，州政府就把燃料税的钱给予公众，公众当然热爱这个政策——每个人都想每月收到支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就会比一般人在限制化石燃料使用上做得更好。

R：但是显而易见，增收碳税是国会很难通过的政策，您为什么认为这个政策一定要实施？

H：奥巴马总统在想办法解决气候问题，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事实是在没什么用。我认为，化石燃料这么便宜，人们肯定会持续使用它们。所以政府应该增加投资来发展清洁能源。

R：您在巴黎参加气候大会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加州，然后来到中国，对这次中国在气候大会中的参与如何看待？

H：中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完成了很伟大的工作。据我所知，煤是中国的最主要燃料，这造成了空气污

染等问题，但是中国不能等到解决了空气污染问题再来参与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当中来，那就太迟了。中国必须现在就着力解决这两个问题。

R：对比中国和印度，您认为哪个国家目前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作用更大？

H：当然是中国。印度当然也是人口大国，也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但是中国的能源需求更大。美国、欧洲把大量的加工厂开在中国，也开在印度，这给了中国和印度更大的环境负担，我们已经不能够简单地指责新兴国家在全球变暖过程中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更多，因为中国承担着世界的加工工作，这也曾是“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争议，但是这次能够达成“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R：您从 1981 年开始任职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到 2013 年退休，这期间您在 NASA 的工作主要是哪些方面？为何会率先提出全球变暖理论，甚至到国会去听证？

H：我是一个科学家，提出客观的理论，推进社会的发展，是我的责任。我曾经在 NASA 研究航天问题，但是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来我渐渐发现，地球才是我的兴趣。全球变暖威胁着地球的存在。所以我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直到现在。

我确实在 NASA 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那时候的 NASA 是一个年轻、有活力、容



纳各种意见的地方，是世界上科学家所能工作的最好的地方之一。现在，它有了一些变化，当然，对科学家来说，它依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随着NASA的成立时间越来越长，它慢慢变得有一点官僚主义。我认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是最好的研究机构，对于我们这样的科学家来说。

R：从您的个人经验来看，为什么NASA不再是“最好的地方”？跟NASA从2005年干预您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发言有关吗？

H：是的，我一直对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全球变暖的问题发表着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全球变暖很危险，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这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影响着纽约、伦敦、上海等各个城市，所以，应该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增收碳税。但是从2005年12月我在旧金山美国地理联盟演讲之后开始，NASA的管理人员、公关人员开始检查我的公开发言，他们告诉我，这跟其它联邦机构对于员工的发言要求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上的发言，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没有人能例外。

R：这是不是就是您之前在《卫报》采访中说的“科学家应该接受客观性训练，不应该有人来阻止科学家们说出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真相”？您曾因为宣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被捕？

H：是的。我记得我写信给艾克森美孚（世界上总市值最大的股票公开上市的石油公司），抗议他们出资

修改研究生学院和初高中的教科书，让这些教科书里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好像我们这些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尚不清晰似的，修改后的教材里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造成了气候变化。但事实上我们很清楚就是人类造成的，而且我们也很清楚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威胁。

当然，我的抗议显得好像我是个犯罪分子。但是现在，很多石油行业的领军人物都说他们愿意投身于气候问题的解决中来，因为他们都有子孙后代，所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给他们一个动机去促进增加碳税，事实上，他们是愿意的。但是我们的政府没能这么做。

这真的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弊端，要通过这个政策可能需要很久，很难

推行。我真的要责怪我们的政府，他们总是看起来在做一些事情，但其实这都是谎言，是欺骗，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应该更加精明地理解气候政策，在全球碳排放的减少中贡献力量。

R：您谈到美国政府通过这项政策很难，谈到民主制度下这项政策很难推行，可以解释一下吗？

H：其实我没看见任何政治家，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有真的提出过增收碳税的政策。目前有一个组织，我想强调一下，那就是一个叫做“公民气候游说”（Citizens Climate Lobby）的组织，这是一个非盈利，无党派，基层宣传组织，致力于国家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

这个组织的规模在过去几年里增长了一倍，于是他们的意见开始形成了一定影响。民主党曾草拟过一项增收碳税的法案，但是政府要拿走其中40%的资金，使得这项草案难以被通

过。而且，保守党人也不会接受这项政策，因为这会产生税收，税收会让经济低迷，碳税事实上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

R：这次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您在接受《卫报》和《赫芬顿邮报》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西南极洲冰盖的崩塌，请问这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H：这意味着海平面将上升好几米，这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带给我们最大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就要被淹没了。这对经济上的破坏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气候难民”，比如孟加拉国，将会产生1亿的难民，他们不得被迫迁徙到其它地方，所以这真的很严重，很难想象如果我们让南极冰盖崩塌，还怎么去支配和管理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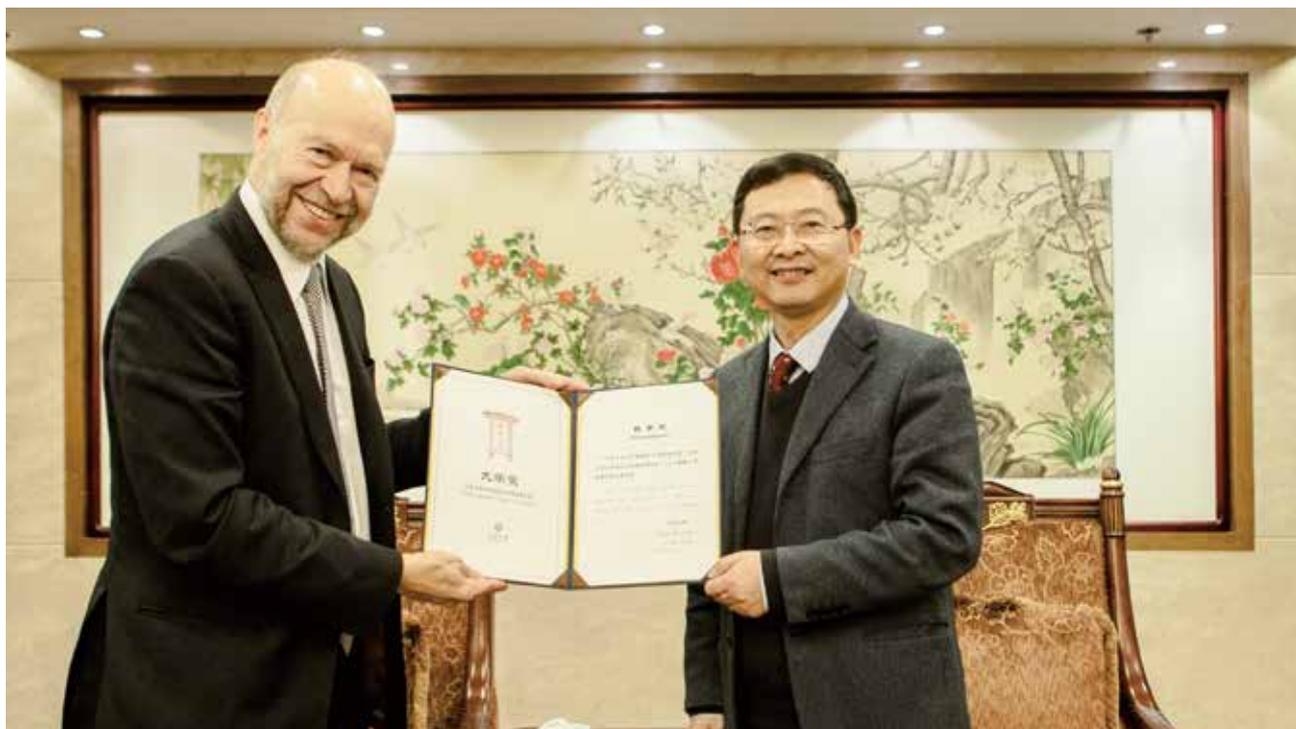
R：如果建一些海堤的话有用吗？

H：对小部分区域来说，可能还

可以。但是当飓风袭来，水就会推翻海堤，所以建海堤并不实用。我们必须保持海平线稳定不上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巨大的经济破坏。这就需要从减少碳排放，遏制全球变暖做起，每年减少一定比例的碳排放，就能一点点保持海平线的稳定。目前我认为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对能源企业增收碳税，如我刚才所说。否则，人们就会继续燃烧让气候变暖加剧的便宜燃料，这些达成《巴黎协议》的国家都说，好吧，我们要减少30%的碳排放量。但是，如果燃料价格还是不变，依然会有人用它们，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

R：那么，您所说的这些沿海城市，比如纽约、上海、旧金山，如果气候变化没有被遏制，这些城市会怎样？

H：看看纽约、上海，如果海平面再上升几米，就没人能保护这些城市了，去保护这些城市根本就不实际。所以必须防患于未然。合



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之 《“黑脚”的汉语之路：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口述》

2015年10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教授整理的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口述史《“黑脚”的汉语之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本书中，白乐桑 (Joel Bellassen) 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学习经历和职业发展，作为汉语教学领域的著名专家，白乐桑先生介绍了自己的重要学术成就，并对汉语国际推广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白乐桑1974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学和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在法国乃至全球汉语教学研究的图景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白乐桑被法国教育部任命为首位专职汉语总督学，他在汉语推广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大力推动了法国在中学阶段的汉语教学。



白乐桑 口述
孔寒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